

论列宁主义基础

列宁主义万岁

斯大林 中共中央

群众出版社

引言

《论列宁主义基础》是苏联革命家斯大林创作的政治著作，首次发表于1924年4月。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俄语：И о с и 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英语：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导人。1922年担任苏共总书记。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为了回击托洛茨基等人对列宁主义的攻击，保卫列宁主义，为使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正确理解列宁主义，斯大林继《论列宁》之后，于1924年4月初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了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重要讲演。

《论列宁主义基础》全书共分九章，斯大林就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方法、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农民问题，民族问题、战略与策略、党，工作作风等问题扼要地论述了列宁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所作的新贡献，说明列宁如何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中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序言中，斯大林提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和这个机会主义做无情的斗争不能不是列宁主义重要的任务之一。

关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问题，斯大林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旧的“繁荣的”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金融集团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利益产生的矛盾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三者决定了帝国主义不仅使革命成了不可避免的实践问题，而且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这就是列宁主义产生的国际环境。而列宁主义之所以诞生于并不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俄国，是因为俄国是当时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俄国当时孕育革命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所以只

有俄国才能用革命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正因为如此，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俄国共产党人的领袖列宁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者。

关于列宁主义的方法问题，斯大林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教条主义做法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列宁主义的方法正是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环境中产生和锻炼出来的，它有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在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恢复被第二国际破坏了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消灭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状态；第二，要根据第二国际各党的实际行为，而不是根据它们的口号和决议来检查第二国际各党的政策；第三，要按新的革命的方式，用教育群众和训练群众去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第四，无产阶级政党要进行自我批评，要从自己的错误中接受教育。斯大林指出，列宁方法的原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基本上已经有了。列宁的方法不仅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复，不仅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恢复，而且是这个方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

关于理论问题，斯大林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二是抨击了机会主义的“自发论”，指出自发论是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理论，是降低自觉因素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三是认为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包括：第一，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某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是世界帝国主义展现的链条在某个国家内断裂的结果。1917年的俄国是帝国主义展现的链条薄弱的环节，无产阶级革命得以在此爆发。第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鸿沟，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关于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来“立刻”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第三，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获得胜利的革命的任务就在于“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斯大林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地位和使命。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是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成绩，把无产阶级

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第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新型民主的国家，是对无产者和一切穷人民主，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能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平发展的结果，而只能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结果。第三，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以前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现在成了全部国家政权和全部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以前不能平等享受到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群众现在被吸引来经常参加国家的民主管理并且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关于农民问题，斯大林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农民是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第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性决定农民最终离开资产阶级，转而服从无产阶级这个革命领袖的领导。第三，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更加革命化，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第四，在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经济建设成为首要问题，使农民合作化是列宁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

关于民族问题，斯大林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最近二十年来，民族问题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看待民族问题要注意区分两种不同性质，即革命的与反革命的，进步的与反动的。在估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时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第二，在概括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十条原理的基础上，论述了民族问题的两个趋向：一个是在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地剥削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力求在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束缚而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趋向。一个是因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形成而产生的，它力求使各民族在经济上彼此接近的趋向。对于帝国主义，这两个趋向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共产主义，恰恰相反，这两个趋向不过是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只有根据相互信任和自愿协定的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愿联合，只有经过使殖民地“从‘统一的’帝国主义‘整体’分离出来的道路，经过使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才能达到。

关于战略和策略，斯大林讲了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科学。二是战略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上主要的打击方向，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其后备军有关。三是策略是随着来潮退潮而变更的。四是战略指导的任务是要正确运用一切后备军来达到革

命在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目的。五是策略指导的任务是要掌握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保证这些形式的正确运用，以取得战略胜利所必需的最大成果。六是革命的策略和改良主义的策略有本质区别。前者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后者改良就是一切。

关于党的问题，斯大林论述了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建立的必要性及其特点。第二国际各党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新型政党的特点：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关于工作作风，斯大林指出，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

该文最早载于1924年4月26日和30日、5月9日、11日、14日、15日和18日《真理报》第96、97、103、105、107、108和121各号。中译文被收入《斯大林全集》第6卷。

目 录

引 言	i
目 录	vi
论列宁主义基础	1
一、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3
二、方法	7
三、理论	12
四、无产阶级专政	24
五、农民问题	32
六、民族问题	41
七、战略和策略	47
八、党	59
九、工作作风	69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71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81
一	83
二	86
三	91
四	96
× × ×	100
列宁主义万岁	102
一	102
二	107
三	114
四	119
五	126
六	131
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	134
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	146

论列宁主义基础^①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献给
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

约·斯大林
一九二四年四月

列宁主义的基础是个很大的题目。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题目就得写一整本书，甚至要写好几本书。因此，我的讲演自然就不能详尽地说明列宁主义，至多也只能简要地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虽然如此，我认为做这样一个叙述来指出几个为顺利研究列宁主义所必需的基本出发点，还是有益处的。

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并不是叙述列宁的世界观的基础。列宁的世界观和列宁主义的基础按范围来说并不是一回事。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世界观的基础当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叙述列宁主义应当从叙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开始。叙述列宁主义就是叙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因而自然和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我在我的讲演中只想从这个意义上来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

那么，列宁主义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应用。这个定义含有一部分真理，可是它远没有概括全部真理。列宁确实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俄国实际情况中，而且应用得十分巧妙。但是，如果列宁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特殊环境中的应用，那么列宁主义就纯粹是一国的而且仅仅是一国的现象，纯粹是俄国的而且仅仅是俄国的现象了。可是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个定义带有片面性。

^① 约·维·斯大林的讲演“论列宁主义基础”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和五月的“真理报”上。一九二四年五月出版了约·维·斯大林的小册子“论列宁和列宁主义”，其中编入了回忆录“论列宁”和讲演“论列宁主义基础”。约·维·斯大林的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编入了约·维·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的各次版本中。

另一些人说，列宁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因素的复活，而和四十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据说四十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温和而不革命的了。如果撇开这种把马克思的学说分为革命部分和温和部分的愚蠢庸俗的见解不说，那就必须承认，即使这个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定义也含有一部分真理。这一部分真理就在于列宁确实复活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但这只是一部分真理。关于列宁主义的全部真理是：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and 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处在革命（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那时还没有发达的帝国主义，是训练无产者去进行革命的时期，那时无产阶级革命还不是必不可免的直接实践问题。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列宁却处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个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开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纪元即苏维埃纪元的时期。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

人们通常都指出列宁主义具有非常战斗、非常革命的性质。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列宁主义所以具有这个特性，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列宁主义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它不能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特色；第二，列宁主义是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搏斗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而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斗争，向来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胜利斗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不要忘记，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不能不是列宁主义的极重要的任务之一。

一、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即在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达到极点、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训练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的旧时期已经达到尽头而转变为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的条件下成长和形成的。

列宁把帝国主义叫做“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在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三个。

第一个矛盾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工业国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金融寡头拥有极大的势力。和这种极大的势力作斗争，工人阶级通常采用的手段，如工会和合作社、议会政党和议会斗争等等已经完全不够了。或者向资本屈服，依旧过着每况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拿起新的武器，——这就是帝国主义在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提出的问题。帝国主义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

第二个矛盾是各金融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就是为独占这些原料产地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就是为重新瓜分已经被瓜分完的世界而进行斗争，就是寻找“阳光下的地盘”（注：“阳光下的地盘”一语引自德意志帝国外交大臣伯·毕洛夫的演说。1897年他在国会中说：“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的新起金融集团和列强对死抓住既得赃物不放的老旧金融集团和列强进行特别猛烈的斗争。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这种疯狂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别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这一不可避免的因素。而这个情况的特点又在于它使帝国主义者彼此削弱，使整个资本主义阵地削弱，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逼近，使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实现。

第三个矛盾是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亿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十亿居民施行最无耻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可是，帝国主义在剥削这些国家时不得不在那里敷设铁路，设立工厂，建立工商业中心。无产者阶级的出现，本地知识分子的产生，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运动的加强，就是这个“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所

有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强都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情况对于无产阶级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根本破坏资本主义的阵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

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使旧的“繁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的那些矛盾，大体上就是这样。

十年前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意义，也就在于它把所有这些矛盾集合在一起投入天平盘里，因而加速和便利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

换句话说，帝国主义不仅使革命成了必不可免的实践问题，而且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

这就是产生列宁主义的国际环境。

有人会向我们说：这一切都不错，但是这和当时并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俄国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和首先是在俄国而且为俄国工作的列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正好是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的诞生地呢？

因为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合点。

因为俄国当时孕育着革命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所以只有俄国才能用革命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

首先，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在俄国，资本的极大势力和沙皇制度的暴虐、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屠杀政策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列宁说得对：沙皇制度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

其次，沙皇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最大的后备军，这不仅是说它任凭外国资本自由进入，让外国资本操纵俄国国民经济中象燃料和冶金业这样一些有决定意义的部门，而且是说它能拿出千百万士兵去供西方帝国主义者使用。请回想一下一千四百万俄国军队为了保证英法资本家极高的利润而在帝国主义战线上流血牺牲的事实吧。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仅是帝国主义在东欧的看门狗，而且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它从巴黎和伦敦、柏林和布鲁塞尔得到借款，而从人民身上榨取几亿卢布来缴付利息。

最后，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国主义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等等勾当中的最忠实的同盟者。谁不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是沙皇政府和协约国帝国主义联合进行的呢？谁不知道，俄国是这次战争的重要角色呢？

正因为如此，沙皇制度的利益就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终于融合为统一的帝国主义的利益。

西方帝国主义在为维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倾注全力同俄国的革命决一死战之前，它能甘心失掉象旧时沙皇资产阶级俄国这样一个东方强大的支柱，这样一个人力物力的丰富宝库吗？当然不能！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谁想打击沙皇制度，谁也就必然要动手打击帝国主义；谁起义反对沙皇制度，谁也就必须起义反对帝国主义。因为谁要是真想不仅摧毁沙皇制度，而且彻底铲除沙皇制度，那么他推翻沙皇制度也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这样，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起来，并且一定要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

而且，当时在俄国又掀起了最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世界上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俄国的革命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这样的革命决不会半途而废，它一胜利就一定要举起反帝国主义的起义旗帜，继续前进，这难道还要证明吗？

正因为如此，俄国当时一定要成为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这不仅因为这些矛盾正是在俄国带有特别丑恶和特别不堪的性质而最容易暴露出来，也不仅因为俄国当时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把西方金融资本和东方殖民地联结起来的最重要的支柱，而且因为当时仅仅在俄国才有能够用革命方法来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现实力量。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俄国革命不能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它不能不在一开始发展时就具有国际性质，因而也就不能不震撼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

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俄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狭隘民族范围内呢？当然不能！恰恰相反，当时整个环境，无论是国内环境（深刻的革命危机）或国外环境（战争），都推动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超出

这个范围，把斗争搬到国际舞台上去，割开帝国主义的脓疮，证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粉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最后，推翻本国资本主义并为无产阶级锻炼出新的斗争武器，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以促进世界各国无产者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俄国共产党人不能不这样行动，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可以指望国际环境发生某种变化，使俄国能够避免资产阶级制度的复辟。

正因为如此，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俄国共产党人的领袖列宁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者。

俄国和列宁的“遭遇”差不多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遭遇”一样。德国当时孕育着资产阶级革命，正象俄国在二十世纪初期一样。当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写道：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②

换句话说，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移到德国了。

几乎用不着怀疑，马克思在上述这段话中所指出的情况，大概正是德国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地、德国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的原因。

关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也必须这样说，而且更必须这样说。这个时期的俄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它应当在欧洲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英法更不用说）更发展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革命；并且一切事实都表明这个革命一定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酵母和序幕。

不能认为下面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就是早在 1902 年，当俄国革命刚刚萌芽的时候，列宁就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写了以下的预言：

“历史现在向我们〈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约·斯大林注〉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四十一页。

……“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四五页）

换句话说，革命运动的中心一定要移到俄国来。

大家知道，俄国革命的进程足以证实列宁的这个预言而绰绰有余。

既然如此，那么进行过这样的革命和具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的诞生地，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同时也成了这个理论和策略的创造者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二、方法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占统治的整个时代。为了说得确切起见，我应当补充一下：这里所指的不是机会主义在形式上的统治，而只是机会主义在事实上的统治。在形式上，当时领导第二国际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正统派”，即考茨基等人。可是在事实上，第二国际的基本工作是按照机会主义的路线进行的。机会主义者由于他们那种惯于迁就的小资产阶级天性而迁就了资产阶级，而“正统派”又为了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为了维持“党内和平”而迁就了机会主义者。结果就造成了机会主义占统治的局面，因为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正统派”的政策已经完全结合起来了。

这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即所谓战前的时期。当时帝国主义的那些毁灭性的矛盾还没有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当时工人的经济罢工和工会还比较“正常地”发展着；当时用选举斗争和议会党团还能收到“令人头晕目眩的”成效；当时人们把合法斗争形式捧到天上，并想用合法手段来“消灭”资本主义，——总而言之，当时第二国际各党养得肥肥胖胖，不愿意认真地想到革命，想到无产阶级专政，想到群众的革命教育。

脱离了生动的群众革命斗争并变成陈腐教条的一些自相矛盾的理论和理论片断，代替了完整的革命理论。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记起马克思的理论，但目的是要阉割这个理论中活的革命的灵魂。

萎靡的庸俗见解和小气的政客手腕，议会的外交手腕和议会的拉拢行为，代替了革命政策。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通过一些“革命的”决议和口号，但目的是要把这些决议和口号束之高阁。

不是使党根据本身的错误来接受教育和学习正确的革命策略，而是小心躲避迫切的问题，掩饰和抹杀这些问题。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不反对谈谈迫切而困难的问题，但目的是要用一种“橡皮性的”决议来敷衍了事。

第二国际的面目，它的工作方法，它的武库，就是这样。

然而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搏斗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在金融资本的极大势力面前，旧的斗争方法显然已经不够而无能为力了。

当时必须重新审查第二国际的全部工作及其整个工作方法，必须驱除庸俗见解、狭隘观点、政客手腕、叛徒行为、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必须检查第二国际的整个武库，抛弃一切生锈的陈腐的东西，锻炼出新式的武器。不做这种预备工作，就根本不能去和资本主义作战。不做这种预备工作，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搏斗面前就会陷于武装不足甚或完全没有武装的危险境地。

对第二国际的奥吉亚斯的牛圈（注：据希腊神话传说，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后来人们用“奥吉亚斯的牛圈”来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做一番总检查和总清洗这一光荣任务就落到了列宁主义的肩上。

列宁主义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锻炼出来的。

这个方法的要求是什么呢？

第一，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在生动的实践的烈火中**检验**第二国际的各种理论教条，就是说，要恢复那个被破坏了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消灭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创立具有革命理论武装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

第二，要根据第二国际各党的实际行为，根据它们的行动，而不根据它们的口号和决议（它们的口号和决议是不可相信的），来**检查**第二国际各党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任并当之无愧。

第三，要按新的革命的方式，用教育群众和训练群众去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去**改造**全部党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训练群众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第四，要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自我批评**，要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身的错误来学习和接受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党的真正干部和真正领导者。

列宁主义的方法的基础和实质就是这样。

这个方法是如何实际应用的呢？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有许多理论教条，他们总是反复地搬弄这些教条。现在就拿其中的几个教条来看吧。

第一个教条：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机会主义者硬说：无产阶级本身如果在全国人口中不占多数，就不能而且不应当夺取政权。一点证据也没有，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可能为这个荒谬的论点辩护。列宁回答第二国际的先生们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历史环境（战争、农业危机等等），使虽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把极大多数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那么，为什么它不应当夺取政权呢？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应当利用顺利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来突破资本战线，加速总爆发呢？难道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说过，如果当时在德国可以用“再版的农民战争”^③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会“很好”了吗？难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当时德国无产者，比如说，和1917年俄国无产者比较起来是更少吗？难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没有表明，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所喜爱的这个教条对于无产阶级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打击和打破了这个陈腐的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二个教条：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的、成熟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就不能保持政权，因此首先必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造就这种干部，然后才夺取政权。列宁回答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为什么不能把事情颠倒过来，先夺取政权，为无产阶级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然后一日千里地前进，来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来造就很多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和行政干部呢？难道俄国的实践没有表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的增长要比在资本政权下迅速百倍和牢靠百倍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也在无情地打碎机会主义者的这个理论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③ 指卡·马克思于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给弗·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八十六页）。

第三个教条：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是无产阶级不能采用的，因为这种方法既然在理论上没有根据（见恩格斯的批评），在实践上有危险（会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常态，会耗尽工会的基金），它就不能代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即议会斗争形式。列宁主义者回答说：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当时所批评的并不是任何总罢工，而只是某种总罢工，即无政府主义者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提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总罢工^④，——这和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么人和在什么地方证明了议会斗争形式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呢？革命运动的历史难道不是证明议会斗争仅仅是组织无产阶级的议会外斗争的学校和助力吗？难道不是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是要用暴力，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直接斗争，用他们的总罢工，用他们的起义来解决的吗？第三，关于用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来代替议会斗争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呢？主张政治总罢工的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曾经打算用议会外斗争形式来代替议会斗争形式呢？第四，难道俄国革命没有表明，政治总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的学校，是在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前夜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吗？——这和那些因为怕破坏经济生活的常态、怕耗尽工会的基金而发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斗争的实践也在粉碎机会主义者的这个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如此等等。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革命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幼稚病》^⑤），因为理论应当服务于实践，因为“理论应当回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人民之友》^⑥），因为理论应当由实践材料来检验。

至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政治口号和政治决议，只要回忆一下“以战争对付战争”这一口号的历史，就足以了解这些以堂皇的革命口号和决议来掩饰自己的反革命勾当的党的政治实践是如何虚伪和腐败。大家都还记得第二国际

^④ 指弗·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三年俄文版第十五卷第一〇五页至第一二四页）。

^⑤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九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六九三页）。

^⑥ 弗·伊·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二七四页至第二七五页）。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⑦上举行的堂皇的示威，当时第二国际恐吓帝国主义者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敢于发动战争，那就要遇到可怕的起义；他们提出了“以战争对付战争”的吓人口号。可是过了不久，在战争就要爆发的时候，巴塞尔决议就被束之高阁，而向工人提出了新的口号——为了资本主义祖国的光荣而自相残杀。这一点有谁不记得呢？革命的口号和决议如果不加以实现，是一个钱都不值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要把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和第二国际在战争时期的叛卖政策比较一下，就可以了解机会主义的政客是如何卑鄙，而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如何伟大。

这里我不能不引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在这本书中无情地痛斥了第二国际首领卡·考茨基企图不按实际行动去判断党，而按纸上口号和文件去判断党的机会主义态度：

“考茨基实行典型的市侩庸人政策，以为**提出口号就能改变事情……全部资产阶级民主史打破了这种幻想**，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欺骗人民，过去和现在总是**什么‘口号’都提得出来的**。问题是要**考察他们的诚意**，把他们的言论和他们的行动加以比较，不要满足于**唯心主义的或骗人的空话**，而要**彻底找到阶级的现实**。”（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六〇页）

至于第二国际各党害怕自我批评的态度，它们那种竭力掩饰自己的错误、抹杀迫切而困难的问题、用一些只能把生动的思想消磨净尽而使党难于根据本身的错误去接受革命教育的粉饰太平的虚伪词句来掩盖自己的缺点的态度，那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态度受到列宁的讥笑和痛斥。列宁在他的《幼稚病》一书中谈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批评问题时写道：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

⑦ 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由于巴尔干战争和世界大战危险的迫近而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共同反对战争这个问题。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宣言中号召工人运用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力量进行反对战争危险的革命斗争，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

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九页）

有些人说：揭露本身的错误和进行自我批评，这对于党是有危险的，因为这会被敌人利用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列宁认为这种反驳是不郑重的，是完全不正确的。关于这一点，列宁还在1904年，当我们党还幼弱的时候，就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说过：

“他们〈即马克思主义者的敌人。——约·斯大林注〉一看见我们发生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摘引我这本专门谈论我们党内种种缺点的小册子中的个别词句。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是久经战斗的了，决不会为这小小的针刺所惊扰，却能够不管这些针刺，继续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而且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九〇页）

列宁主义方法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

列宁的方法的原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基本上已经有了。这个学说，照马克思的话说来，“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⑧。列宁的方法正是从头到尾都贯串了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可是，如果以为列宁的方法仅仅是马克思的方法的恢复，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列宁的方法不仅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复，不仅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恢复，而且是这个方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

三、理论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三个问题：

- （甲）理论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意义；
- （乙）对自发“论”的批判；
- （丙）无产阶级革命论。

^⑧ 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一卷序言第二十三页。

(1)理论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列宁主义是实践重于理论，就是说，列宁主义的主要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为事实，是“执行”这些原理，至于理论，列宁主义似乎是很不关心的。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屡次嘲笑列宁对于理论，特别是对于哲学的“不关心”。大家也知道，现在许多列宁主义的实际工作者不很喜欢理论，特别是因为他们由于环境关系而不得不忙于浩繁的实际工作。我必须指出：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所持的这种非常奇怪的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是丝毫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工作者忽视理论的趋向是和列宁主义的全部精神相矛盾的，而且对工作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么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进行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不是别人而正是列宁说过和重复过几十次下面这个著名的原理：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三四一页；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列宁比谁都更了解理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党这样一个党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党负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因为我们党处于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列宁还在 1902 年预察到我们党的这种特殊作用时，就认为必须指出：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同上，第三四二页）

几乎用不着证明，现在当列宁的关于我们党的作用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列宁的这个原理具有特别巨大的力量和特别重大的意义。

依据唯物主义的哲学，把从恩格斯到列宁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概括起来，并从各方面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别，这是一个极重大的任务，而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列宁，——这个事实可以说是列宁高度重视理论的最明显的表现。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

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⑨大家知道，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⑩这部杰作中为自己的时代完成了这个任务。大家知道，喜欢嘲笑列宁“不关心”哲学的普列汉诺夫竟不敢认真着手执行这个任务。

(2)对自发“论”的批判，或关于先锋队在运动中的作用。自发“论”是机会主义的理论，是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理论，是实际上否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理论。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质，反对使工人运动循着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路线行进，而主张使工人运动仅仅循着资本主义“可以履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的路线行进，完全主张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自发论是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使自发运动带有自觉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反对党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反对党把群众提高到自觉的水平，反对党领导运动，而主张使运动中的自觉因素不致妨碍运动循着自己的道路行进，使党只依从自发运动，做运动的尾巴。自发论是降低自觉因素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

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前，这个理论就已经登台，而在实际上使它的那些信徒即所谓“经济派”否认俄国有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鼓吹运动中的工联主义政策，把工人运动完全交给自由资产阶级去领导。

旧《火星报》的斗争和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对“尾巴主义”理论的精彩批判不仅粉碎了所谓“经济主义”，而且还建立了俄国工人阶级真正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

当时如果没有这个斗争，就休想在俄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就休想使这个党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可是，崇拜自发性的理论不仅是俄国的现象。它在第二国际所有的党内都是流行得最广泛的，虽然形式稍有不同。我指的是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

^⑨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三七〇页。

^⑩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四卷。

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这个理论为一切事物辩护，使所有的人都调和起来，当某些事实已经被大家听厌以后，才指出这些事实并加以解释，而指出以后，就万事大吉。马克思说：唯物主义的理论不能只限于解释世界，它还应当改变世界。¹¹可是，考茨基及其同伙却不管这一点，他们宁愿停留在马克思的公式的前半段上。

请看应用这个“理论”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吧。有人说，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第二国际各党曾经发表恐吓言论，说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它们就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有人说，在战争就要爆发的时候，这些党却把“以战争对付战争”这个口号束之高阁，而实行了一个相反的口号——“为帝国主义祖国而战”。有人说，这样变更口号的结果，几百万工人牺牲了生命。可是，如果以为这里应该归咎于什么人，这里有什么人叛变了或出卖了工人阶级，那就错了。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一定要这样发生的。第一，因为国际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工具。第二，因为在当时的那种“生产力水平”下，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应该归咎于”“生产力”。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正是这样向“我们”解释的。而谁要是不相信这个“理论”，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党的作用呢？党在运动中的意义呢？可是，党对于象“生产力水平”这样的决定因素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种假冒马克思主义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大堆来。

几乎用不着证明，这个以掩盖机会主义的真面目为使命的冒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就受到列宁攻击的那个“尾巴主义”理论在欧洲的翻版罢了。

几乎用不着证明，打破这种理论上的假冒，是在西方建立真正的革命政党的先决条件。

(3)无产阶级革命论。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是从三个基本原理出发的。

第一个原理：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内占统治地位；发行有价证券是金融资本的一种主要业务；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是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一；金融寡头的极大势力是金融资本统治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揭露出垄断资

¹¹ 卡·马克思“费尔巴哈论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四〇一页至第四〇四页）。

本主义的明显的寄生性，使资本主义的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压迫百倍沉重起来，使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愤怒更加增长，把群众引上无产阶级革命这条唯一的生路。（见列宁《帝国主义论》¹²）

由此得出第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

第二个原理：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和殖民地领土，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所有这些，一方面使各个民族的经济和领土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又把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另一方面是不得不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占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见《帝国主义》）

由此得出第二个结论：殖民地国家内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外部的殖民地战线上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因素日益增长。

第三个原理：独占“势力范围”和殖民地；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使那些已经抢得领土的国家和那些希望得到自己的“份额”的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帝国主义的战争是恢复已经被破坏的“均势”的唯一手段，——所有这些都使第三条战线即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线紧张起来，因而使帝国主义削弱，并使头两条反帝国主义战线即革命的无产阶级战线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战线易于联合起来。（见《帝国主义》）

由此得出第三个结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

列宁把上面一切结论综合为一个总的结论说：“**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五页；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因此，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性质、范围和深度问题的看法本身也要改变，整个革命的方案，也就随着改变了。

¹² 弗·伊·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三页至第二九〇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九一八页至第一〇三二页）。

从前，通常都是根据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去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现在，这种看法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根据一切国家或多数国家的经济状况，根据世界经济状况来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个别国家和个别民族的经济已经不是独立自在的单位，已经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因为旧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是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

从前，通常都是说，在个别国家内，或者确切些说，在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是否已经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说，在世界帝国主义经济这一整体的整个体系中已经具备革命的客观条件；而且，如果整个体系，或者确切些说，因为整个体系已经成熟到发生革命的程度，这个体系中存在着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并不能成为革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从前，通常都是说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认为这是个别的独立自在的现象，而以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为敌方。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已经变成所谓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必须拿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总战线来对抗这个世界帝国主义战线。

从前，总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纯粹是某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果。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首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做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某个国家内破裂的结果。

革命将在哪里开始呢？资本战线首先会在哪里，会在哪个国家内被突破呢？

从前，通常都这样回答：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地方，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分较多的地方。

列宁主义的革命论反驳说：不，**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等等的地方**。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其最薄弱的地方破裂的结果；而且开始革命的国家，突破资本战线的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国家，而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却仍然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

在 1917 年，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俄国比在其他国家薄弱些。这个链条就在这里被突破，而使无产阶级革命得以爆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

在俄国展开了最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千百万被地主压迫和剥削的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因为当时在俄国和革命对立的是沙皇制度这样一个极丑恶的帝国主义代表，它没有丝毫威信，并为全体人民所痛恨。虽然当时俄国资本主义不如法国或德国、英国或美国发达，但是帝国主义的链条在俄国却比较薄弱。

在最近的将来，这个链条将在什么地方被突破呢？还是在它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链条可能在印度被突破。为什么呢？因为印度有年轻的战斗的革命无产阶级，而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民族解放运动这样一个无疑是伟大的和重要的同盟者。因为在印度和革命对立的是外国帝国主义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敌人，它没有丝毫威信，并为印度全体被压迫被剥削群众所痛恨。

这个链条也很可能在德国被突破。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在印度发生作用的那些因素，在德国也开始发生作用；同时，印度和德国在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别，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德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会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五七页）

简单地说：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多少、农民占百分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

正因为如此，计算个别国家内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百分数，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已经失去了第二国际的那些不了解帝国主义的、象害怕瘟疫那样害怕革命的书呆子们所喜欢赋予它的特殊意义。

其次，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曾经断定说（现在仍然断定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隔着一道鸿沟，或者至少是一座万里长城，使这两个革命之间隔着一个相当长的间断时期，在这个间断时期中，已经获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则积聚力量，准备对资本主义进行“决战”。这个间断时期通常是以好几十年来计算的，甚至更长些。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万里长城“论”在帝国主义环境中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它只是

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欲望的掩蔽物和粉饰品。几乎用不着证明，在孕育着冲突和战争的帝国主义环境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环境中，当“繁荣的”资本主义已经变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而革命运动正在世界各国发展的时候，当帝国主义同包括沙皇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内的所有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因而使一切革命势力，从西方的无产阶级运动到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必须联合起来的时候，当不和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就不能推翻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时候，——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种条件下，在一个较为发达的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的历史显然证明了这个原理是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无怪乎列宁还在 1905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就在他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做一个链条的两个环节，看做俄国革命规模的一幅完整的图画：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火星派在他们关于革命规模的一切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页）

我且不说列宁的其他较晚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这一点比在《两种策略》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有些同志却以为列宁在 1916 年才产生这种思想，以为列宁在 1916 年以前还认为俄国革命将停滞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于是政权也将从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机关手里转到资产阶级手里，而不是转到无产阶级手里。据说这种论断竟流传到我们共产党的报刊上来了。我必须指出，这种论断是完全不正确的，是完全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我可以引证列宁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 年）上的著名演说，他在这篇演说中不是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即民主革命的胜利称为“‘秩序’的组织”，而是称为“战争的组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三五三页）

其次，我还可以引证列宁论临时政府（1905 年）¹³的几篇著名论文，他在这几篇论文里描述俄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时向党提出的任务是“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多年的运动，而不是几个月的运动，使这个革命不仅得到执政当局的微小让步，而且要完全推翻这个执政当局”；他在这几篇论文里进一步阐明这个前途并把这个前途和欧洲的革命联系起来时继续写道：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延烧欧洲；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下备受折磨的欧洲工人也将发动起来，并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年的革命时代……”。（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二五九页）

其次，我还可以引证列宁在 1915 年 11 月发表的著名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无产阶级现在为夺取政权、为建立共和国、为没收土地……为吸收‘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即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斗争，将来还要为此英勇忘我地进行斗争。对于这种使资产阶级俄国从沙皇制度下、从地主的土地权力下获得解放的运动，无产阶级将立即（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加以利用，无产阶级不是用来帮助富裕的农民去反对农业工人，而是用来联合欧洲各国的无产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二页至第三八三页）

最后，我还可以引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的一段著名言论，他在这里援引了我们刚才从《两种策略》中引证过的那段关于俄国革命规模的话，而得出如下的结论：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以外，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

¹³ 约·维·斯大林援引的是弗伊列宁在一九〇五年所写的文章：“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从这篇文章中引了一段话），“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论临时革命政府”（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二四七页至第二六三页、第二六四页至第二七四页、第四二七页至第四四七页）。

里长城，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六页至第二七七页）

看来已经够了。

有人会向我们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列宁和“不断（不间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

因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农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因而妨碍了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妨碍了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事业。

因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看象农奴制残余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不考虑到俄国农民这样的重大力量；他们不知道这样政策只能阻挠把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事业。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军的作用，由于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不断”革命的思想不能看做是一种新的思想。这种思想最初是马克思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他的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中提出的。我们的“不断论者”正是从这个文件中取得不断革命的思想的。必须注意到，我们的“不断论者”从马克思那里把这个思想拿来以后，就多少改变了这个思想，而一改变了它，就把它“弄坏了”，使它不合实用了。当时需要列宁用老练的手法来纠正这个错误，取得马克思的真正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而使它成为自己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

请看马克思在他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列举了他号召共产主义者应当争取的许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后，关于不断革命的问题是怎样说的：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

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¹⁴

换句话说：

（甲）马克思根本没有主张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来**开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革命事业，这和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的计划是**相反的**；

（乙）马克思只是主张以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来**完成**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把资产阶级派别从政权的高峰上逐个推下去，以便在争得无产阶级政权后再把革命火焰燃遍世界各国，这和列宁根据他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以及他在我们的革命过程中所实行的一切是**完全符合的**。

由此可见，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不仅过低估计了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意义，而且改变了（改坏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使它不合实用了。

正因为如此，列宁嘲笑了我国“不断论者”的理论，称之为“独创的”“卓越的”理论，责备他们不肯“想一想，究竟由于哪些原因整整十年的实际生活都没有理睬他那个卓越的理论”。（列宁的这篇论文是在一九一五年，即在俄国“不断论者”的理论出现后过了十年写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页）

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这个理论是半孟什维主义的理论，说这个理论“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见列宁“论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一文，“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页至第三八二页）。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关于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来“立刻”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就是这样。

其次，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要有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要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者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乎实际情形了。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是可能的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跳

¹⁴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一年俄文版第八卷第四八三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八十八页）。

跃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国革命的历史已经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里必须记住：只有具备了某些完全必要的条件，才能顺利地推翻资产阶级；没有这些条件，就根本谈不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请看列宁在他的《幼稚病》一书中关于这些条件是怎样说的：

“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如果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那么革命是不可能的（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且抱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卷入政治运动……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六十五页至第六十六页）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团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¹⁵

¹⁵ 整理者注：当前流传的版本中，这段话被修改为：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是不是说，它这样就能

列宁用一句话说明了这个意思，他说，获得胜利的革命的的任务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 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六九页）。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

四、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三个基本问题：

（甲）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

（乙）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

（丙）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

(1)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首先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规模和成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这个革命的机关，是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据点，它的使命是：第一，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成绩；第二，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革命也能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门机关作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么它就不能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不能保持胜利并向前进展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列宁）这是不是说，事情只限于夺取政权，取得政权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取得政权——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由于许多原因，在长时间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因此，全部问题在于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些什么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终胜利呢？换言之，这是不是说，它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够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也就是免除复辟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主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

至少必须完成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就摆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的三个主要任务：

（甲）粉碎已被革命推翻和剥夺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反抗，消灭他们的一切恢复资本政权的行动；

（乙）用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精神来组织建设工作，并按照准备取消阶级，消灭阶级的方向来进行这一工作；

（丙）把革命武装起来，组织革命军队，以便和外部敌人作斗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执行这些任务，完成这些任务。

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已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到处诉苦，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三页）

而资产阶级是有根据来进行复辟行动的，因为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在长时间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

列宁说：“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就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同上，第二三二页）

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哪里呢？

第一，“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资产阶级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页）

第二，在于“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某些动产（往

往是很多的)；有种种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窍门)；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接近；有无比丰富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二页）

第三，“在于习惯的力量，在于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小生产在世界上可惜还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为“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页至第八页和第二十六页至第二十七页）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而资产阶级因为它被推翻而十倍加强它的反抗。”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同上，第七页和第二十七页）

几乎用不着证明，要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些任务，要在几年内实现这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时期，看做一批“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应该把它看做充满国内战争和国外冲突、顽强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建设、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创造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而且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第一，把自己教育并锻炼成为能够管理国家的力量；第二，按照保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方针来重新教育并改造小资产阶级阶层。

马克思向工人说过：“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八卷第五〇六页）

列宁继承并发展马克思这个思想时写道：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大家都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同样，必须“……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九十五页至第九十六页和第九十四页）。

(2)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在不侵犯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政府人员的普通的更换、“内阁”的更换等等。各国孟什维克和机会主义者害怕专政象害怕火一样，竟用所谓“夺取政权”的概念来顶替专政的概念。他们通常都把“夺取政权”归结为更换“内阁”，归结为由谢德曼和诺斯克、麦克唐纳和韩德逊这一类人组成新内阁执政。几乎用不着解释，诸如此类的内阁更换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夺取真正的政权毫无共同之点的。麦克唐纳之流和谢德曼之流在保留资产阶级旧制度的条件下掌握政权，他们的所谓政府，只能是资产阶级御用的服务机关，只能是帝国主义脓疮的掩蔽物，只能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工具。当资本没有屏风就不便于、不利于、难于剥削和压迫群众的时候，它需要这些政府来做屏风。当然，这种政府的出现是“在他们那里”（就是说，在资本家那里），“在希普卡”（注：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俄军曾冒严寒扼守巴尔干的希普卡山隘，大批士兵冻死冻伤，俄军司令部战报却多次说：“在希普卡平安无事。”）并非平安无事的征兆；虽然如此，这种政府仍然不免是稍加粉饰的资本政府。麦克唐纳政府或谢德曼政府是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相隔天壤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政府的更换，而是拥有新的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新国家，是在旧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产生的无产阶级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破坏资产阶级制度的过程中，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在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过程中，在把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借的革命政权。

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其阶级敌人的反抗的机器。就这一点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和其他任何阶级的专政毫无区别，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是用

来镇压资产阶级的机器。但是这里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以前所有的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者对多数被剥削者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多数被剥削者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

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列宁《国家与革命》）

由此应当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对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对富人又对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无产者和一切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考茨基及其同伙所谓普遍的平等、“纯粹的”民主和“完善的”民主等等的空话，是资产阶级用来掩饰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不可能有平等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纯粹”民主论是帝国主义强盗所驯育和豢养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使命就是要掩盖资本主义的脓疮，粉饰帝国主义，赋予它一种精神力量来反对被剥削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者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这至少是因为房屋、印刷所、纸张仓库等等这些为享有“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是剥削者的特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群众是没有而且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的，这至少是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也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尔德家族和斯汀尼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所指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数被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多数为目标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剥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无产者和农民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被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数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少数为目标的。

第二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不能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平发展的结果，而只能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的军队、资产阶级的官吏机构、资产阶级的警察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1871年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

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¹⁶。

马克思的这句以大陆为限的话竟被各国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作为借口来叫喊：可见马克思曾经假定资产阶级民主有和平发展到无产阶级民主的可能，至少欧洲大陆以外的几个国家（英国和美国）是有这种可能的。马克思的确曾经假定有这种可能，并且有根据来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美两国做这种假定，因为当时还没有垄断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帝国主义，当时在这些国家中由于特殊的发展条件，还没有发达的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出现以前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可是经过三四十一年以后，当这些国家中的情形已经根本改变，当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并普及于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当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也已经在英美出现，当英美和平发展的特殊条件已经消失的时候，关于这些国家不在此限的说法自然就应当失去时效了。

列宁说：“现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立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机构和军阀机构支配一切、镇压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摧毁、破坏‘现成的’（是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完毕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七页）

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

当然，在遥远的将来，如果无产阶级在那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如果现在的资本主义包围被社会主义包围所代替，那么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利”，会认为最好是“自愿地”向无产阶级做重大的让步。可是，这个假定所涉及的只是遥远的和可能的将来。对于最近的将来，这个假定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因此，列宁说得对：

¹⁶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二页和“书信选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二六三页）。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一七页）

(3)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就是镇压资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要依靠什么组织才能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呢？无产阶级的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旧的组织形式不足以完成这个工作，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无产阶级的什么新的组织形式能够起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掘墓人的作用，不仅能够摧毁这个机器，不仅能够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且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基础呢？

无产阶级的这个新的组织形式就是苏维埃。

苏维埃优越于旧的组织形式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最能**包括一切**的群众组织，因为苏维埃，而且只有苏维埃，才能包括所有一切工人。

就在于苏维埃是能够团结所有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工人和农民、士兵和水兵的唯一群众组织，因此在这个组织中，群众先锋队即无产阶级对群众斗争的政治领导就能够最容易和最充分地实现。

就在于苏维埃是群众革命斗争、群众政治发动和群众武装起义的**最强有力的机关**，是能够摧毁金融资本及其政治附属物的极大势力的机关。

就在于苏维埃是群众本身的**直接**的组织，是**最民主**的因而也是群众的最有威信的组织，这种组织能尽量便利群众参加新国家的建设和管理，能尽量发挥群众在毁坏旧制度的斗争中，在建设无产阶级新制度的斗争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创造能力。

苏维埃政权就是把各地方苏维埃统一成为一个总的国家组织，统一成为无产阶级这个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这个统治阶级的国家组织，即统一成为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就在于：正是从前受资本家和地主压迫的那些阶级的最群众化和最革命的组织现在成了“全部国家政权和全部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却受到各种排挤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和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被吸引来经常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

定作用”(黑体都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四三页)。

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政权是新的国家组织形式，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和议会制的国家组织形式有原则上的差别；它是新的国家类型，不适合于剥削和压迫劳动群众的任务，而适合于使他们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的任务，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列宁说得对：自从出现了苏维埃政权，“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制度的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

苏维埃政权的特征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存在着阶级的条件下可能有的一切国家组织中最群众化和最民主的国家组织，因为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剥削农民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结合和合作的场所，并在自己的工作中依靠这个结合和合作，它就是多数居民统治少数居民的政权，是这个多数的国家，是这个多数专政的表现。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阶级社会一切国家组织中最富于国际主义的组织，因为它既然摧毁任何民族压迫而依靠各族劳动群众的合作，它就使这些群众易于在统一的国家联盟内联合起来。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按本身结构来说，使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这个在苏维埃中最团结和最觉悟的核心易于领导这些被压迫被剥削群众。

列宁说：“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中的涣散落后的阶层。”（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四四页）而苏维埃政权的结构有助于实现这个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既然在统一的国家组织内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并用生产单位，用工厂来代替地域选区，就把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同国家管理机关直接联系起来，教他们学习管理国家。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使军队不受资产阶级长官的支配，把军队由资产阶级制度下压迫人民的工具变为使人民从本国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工具。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粉碎和彻底摧毁旧式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僚的、法官的机关”（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四四页）。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才能吸收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群众组织无条件地经常参加国家的管理，只有它才能准备国家的消亡，这种消亡是将来的无国家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之一。

这样，苏维埃共和国就是那个找了很久而终于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这个形式的范围内必将完成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巴黎公社是这种形式的萌芽。苏维埃政权是这种形式的发展和完成。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而且是能够保证最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形式。”（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三四〇页）

五、农民问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四个问题：

- （甲）问题的提法；
- （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
- （丙）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
- （丁）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

(1)问题的提法。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

可是，这个情况丝毫不会使农民问题失去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无疑具有的重大而迫切的意义。大家知道，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认真研究农民问题正是在第一次革命（1905年）前夜开始的，当时推翻沙皇制度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已经全盘摆在党的面前，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已经具有迫切的性质。大家也知道，俄国农民问题在无产

阶级革命时期具有更迫切的性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争取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引起了无产阶级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不言而喻，谁想夺取政权，谁准备夺取政权，谁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列宁主义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第二国际各党所以漠视农民问题，有时简直否认农民问题，不仅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发展条件，而首先是因为它们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害怕革命，不想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而谁要是害怕革命，谁要是想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谁也就不会关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同盟者问题是无所谓的，不迫切的。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把自己讥笑农民问题的态度看作文雅风度的表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其实，这里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也没有，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明显标志。

问题是这样：由于农民的某些生活条件而潜藏在农民内部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农民，把农民中的多数被剥削者由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从前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多数农民具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三次革命的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得出一个实际结论，就是要援助劳动农民群众的反对奴役和剥削的斗争，摆脱压迫和贫困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援助**任何一种**农民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直接或间接地便利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这样或那样地帮助无产阶级革命、促使农民变为工人阶级的后备军和同盟者的那种农民运动和农民斗争。

(2)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包括俄国第一次革命（1905年）和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农民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离开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或称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领袖是巴·尼·米

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企图用立宪君主制的形式保存沙皇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1917年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占据领导地位。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和暴乱。在武装干涉和白卫分子被击溃后，立宪民主党上层的大部分人逃亡国外，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活动。），而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来。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立宪民主党人（自由资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争夺农民的历史。杜马时期决定了这个斗争的命运，因为前后四届杜马时期给了农民一个实际教训，这个教训明明白白地向农民指出：他们从立宪民主党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拥护地主，而立宪民主党人则拥护沙皇；农民所能指望得到帮助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帝国主义战争只是证实了杜马时期的教训，使农民最终离开资产阶级，使自由资产阶级最终陷于孤立，因为战争年份表明：希望从沙皇及其资产阶级同盟者那里得到和平完全是画饼充饥，自欺欺人。如果没有杜马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工农联盟就是这样形成的。在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斗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这样形成的，而这个领导权就引导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奥）资产阶级革命是循着另一条道路进行的。西方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属于当时由于本身幼弱而没有成为并且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而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西方农民摆脱农奴制而获得的解放不是从人数很少和没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而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西方农民是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旧制度的。西方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因此，西方革命的结果使资产阶级的政治比重大大增加了。

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俄国革命的结果不是使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力量加强，而是使它削弱；不是使它的政治后备军增加，而是使它失去了基本的后备军，即失去了农民。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把自由资产阶级提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无产阶级提到了首位，把千百万农民团结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周围。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

俄国革命为什么有这个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独特现象呢？这个独特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比西方更发展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展开的，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所吓倒的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任何革命性（尤其在 1905 年的教训以后），转而同沙皇和地主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反对工农。

必须注意下面几个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

（甲）俄国工业在革命前夜的空前的集中程度。例如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五十四，而象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在同样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只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三十三。几乎用不着证明，单是这一个情况，在具备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条件下，就已经使俄国工人阶级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力量了。

（乙）企业中丑恶的剥削形式，加上沙皇走狗残酷的警察压制，——这个情况使工人的每一次重大的罢工都变成巨大的政治行动，把工人阶级锻炼成为彻底革命的力量。

（丙）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在 1905 年革命以后已经变成对于沙皇制度的效忠和公开的反革命，这不仅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使俄国资产阶级投入沙皇制度的怀抱，而且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直接依赖政府的订货。

（四）农村中最丑恶最难堪的农奴制残余，加上地主的专权，——这个情况使农民投入了革命的怀抱。

（戊）沙皇制度压制一切有生机的东西，并以自己的专横来加重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这个情况使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汇合成一条革命洪流。

（己）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切矛盾融合为深刻的革命危机，并使革命具有莫大的冲击力量。

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应当向哪里走呢？农民应当向谁寻求援助来反对地主专权、反对沙皇专横、反对使农民经济破产的毁灭性战争呢？向自由资产阶级吗？然而它是敌人，——这是前后四届杜马的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

的。向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杂烩，他们“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列宁全集》第9卷第295页）。社会革命党人否认农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多数支持沙皇俄国的战争政策，少数反对战争，形成了后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核心。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党的领袖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在临时政府内担任要职。1917年11月，社会革命党的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段时间内承认苏维埃政权，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始终敌视十月革命。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它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被苏维埃政权粉碎。〕吗？社会革命党人当然比立宪民主党人“好些”，他们的纲领也是“合适的”、几乎是农民的纲领。可是，既然社会革命党人想单单依靠农民，既然他们在成为敌人力量的主要泉源的城市中软弱无力，那么，他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情呢？什么地方有一个新的力量，它无论在农村或城市中都能一往直前，勇敢地走到前列去同沙皇和地主作斗争，帮助农民摆脱奴役，摆脱没有土地的情况，摆脱压迫，摆脱战争呢？当时在俄国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力量呢？是的，是有的。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它还在1905年就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斗争到底的本领、自己的勇气、自己的革命性。

无论如何，除了这个力量以外，别的力量是没有的，而且是无从得到的。

正因为如此，农民在离开立宪民主党人而接近社会革命党人以后，就觉悟到必须服从俄国无产阶级这个勇敢的革命领袖的领导。

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就是这样。

(3)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从二月革命（1917年）到十月革命（1917年）为止。这个时期比较短，总共只有八个月；但是从群众所受到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训练来看，可以大胆地说，这八个月等于平常宪制发展时期的好几十年，因为这八个月是革命的八个月。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农民更加革命化，他们对社会革命党人感到失望，他们离开社会革命党人，他们重

新转向**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认定无产阶级是能把国家导向和平的唯一彻底革命的力量。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社会革命党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民主派）争夺农民、争取掌握多数农民的历史。决定这个斗争的命运，是联合政府时期，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拒绝没收地主土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争取继续作战，前线六月进攻，士兵死刑，科尔尼洛夫叛乱〔注：科尔尼洛夫叛乱指1917年8月间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策划的一次反革命叛乱。指挥这次叛乱的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命的俄国军队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准备叛乱的中心是设在莫吉廖夫的大本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准备这次叛乱的同谋者。科尔尼洛夫于8月25日调集军队，企图占领彼得格勒，消灭苏维埃，建立反革命军事独裁政府。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工人和革命士兵奋起保卫革命，于8月底粉碎了这次叛乱。〕。

如果说从前，在前一时期，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推翻沙皇和地主的政权，那么现在，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时期，当沙皇已经被推翻，而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使国家经济完全破坏，使农民完全破产的时候，消灭战争的问题就成为革命的基本问题了。重心显然已经从纯粹国内性质的问题移到基本问题，即战争问题上了。“结束战争”，“摆脱战争”，——这就是疲惫不堪的全国人民首先是农民的共同呼声。

可是当时要摆脱战争，就必须推翻临时政府，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推翻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因为他们，而且只有他们，要把战争拖延到“胜利为止”。当时除了推翻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别的出路可以摆脱战争。

这是新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它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派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极左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抛出政权以外，以便创立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以便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党，主张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争取民主和平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大多数农民支持了工人为争取和平、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当时在农民面前没有别的出路，而且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这样，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给了劳动农民群众一个最大的实际教训，因为它明明白白地指出：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下，国家是不能摆脱战争的，农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与立宪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们有甜蜜的演说和虚伪的诺言，而事实上他们所执行的还是那个帝国主义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能够引导国家走上大道的政权。战争的继续拖延只是证实了这个教训的正确，督促革命前进，推动千百万农民和士兵群众**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孤立已成为确定不移的事实。如果没有联合政府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促使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是这样。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形成的。

(4)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如果说从前，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主要问题是推翻沙皇制度，而后来，在二月革命以后，首要问题是推翻资产阶级以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那么现在，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经济建设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了。加强和发展国有化工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通过国家所调节的商业把工业和农民经济联系起来；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便后来逐渐减少粮食税额，做到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振兴商业并发展合作社，吸引千百万农民参加合作社，——这就是列宁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面的当前任务。

有人说，这个任务也许是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所不能胜任的。有些爱怀疑的人甚至说，这个任务简直是空想，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农民总是农民，——农民是由小生产者组成的，因此不能利用他们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

但是，爱怀疑的人错了，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在这里有决定意义的一些情况。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其中主要的情况。

第一，决不可把苏联农民和西方农民混为一谈。苏联农民不能不和西方农民有所区别，因为苏联农民经过了三次革命的训练，跟无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手里获得了土地与和平，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西方农民却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斗争，从这个资产阶级手里获得了土地，并因此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未必用得着证明：向来珍视他们同无产阶级的政治友谊和政治合作并把他们获得自由归功于这种友谊和这种合作的苏联农民，不会不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最好对象。

恩格斯曾经说：“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见恩格

斯《农民问题》1922年版¹⁷)他的这一段话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写的,他当时所指的是西方农民。俄国共产党人在三次革命中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已经在农村中给自己造成了我们的西方同志所不敢梦想的影响和支柱,这一点还需要证明吗?这个情况不能不根本促进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实行经济合作的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爱怀疑的人硬说小农是和社会建设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请听一听恩格斯关于西方小农所说的话吧:

“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协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被我们挽救而没有真正转变为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改造。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是白费金钱,然而这却是善于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

恩格斯说这些话时所指的是西方农民。可是,恩格斯所说的这些话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样容易和那样充分地实现,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在苏维埃俄国,才能立刻实行并完全实行使“自食其力的小农来补充我们的队伍”,实行为此所必需的“物质牺牲”,实行为此所必需的“慷慨地对待农民”,而且有利于农民的诸如此类的措施已经在俄国实行,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这个情况也一定会便利并推进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第二,决不可把俄国农业和西方农业混为一谈。西方农业是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是在农民深刻分化的情况下发展的,一极是大田庄和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另一极却是大众的贫穷困苦和雇佣奴隶地位。因此,

¹⁷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四二二页和第四三六页。

在西方，解体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俄国农业应当循着另一条道路，即循着使千百万小农和中农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农村中发展那种由国家以优惠贷款的办法来扶持的群众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发展。列宁在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

在这方面，由于农业合作社工作而在农村中发生的一些新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农业合作总社¹⁸内产生了各个农业部门（亚麻、马铃薯、油类等部门）的新的巨大组织，这些组织是有广大前途的。例如其中的亚麻合作总社包括许多麻农生产协作社。亚麻合作总社以种子和生产工具供给农民，然后向这些农民购买全部亚麻产品，在市场上大批销售；保证农民也得到利润，从而通过农业合作总社把农民经济和国家工业联系起来。怎样称呼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呢？在我看来，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大生产在农业方面的家庭手工制。这里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生产在农业方面的家庭手工制，是和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例如纺织业的家庭手工制相比拟而说的；在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中，手工业者从资本家那里领得原料和工具，而把自己的全部产品交给资本家，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在家里做工的半雇佣工人。这不过是指明我国农业应当循着哪一条道路发展的许多标志之一。其他农业部门中的其他类似的标志，我就不谈了。

未必用得着证明：绝大多数农民乐意走这条新的发展道路，而抛开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和雇佣奴隶地位的道路，贫困和破产的道路。

请看列宁关于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所说的话吧：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

¹⁸ 农业合作总社即全俄农业合作总社，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成立，一九二九年六月撤销。

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

列宁往下讲到必须给予合作社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和新的“社会制度”以财政支持和其他支持时继续说：

“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许多万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并使它实现。但是支持合作社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支持，就是说，把这种支持仅仅了解为支持任何一种合作社的流转是不够的，而应该了解为支持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的合作社的流转。”（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九页）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什么呢？

说明爱怀疑的人是错误的。

说明列宁主义是对的，因为列宁主义把劳动农民群众看作无产阶级的后备军。

说明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运用而且应当运用这个后备军，以便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所绝对必需的基础。

六、民族问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两个主要问题：

（甲）问题的提法；

（乙）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

(1)问题的提法。最近二十年来，民族问题发生了许多极重大的变化。第二国际时期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远不是一回事。不仅按范围来说，而且按内在性质来说，它们都是大不相同的。

从前，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狭隘范围内。爱尔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芬兰人、塞尔维亚人以及欧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关心的就是这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命运。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文明人”和“不文

明人”相提并论。两三个空空洞洞、不痛不痒、竭力回避殖民地解放问题的决议，——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能借以自夸的一切。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两重性和不彻底性可以说已经被消灭了。列宁主义揭露了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

从前，民族自决原则通常都被曲解，往往把它缩小为民族自治权。第二国际的某些首领甚至把自决权变成文化自治权，就是说，被压迫民族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而让全部政权仍旧掌握在统治民族手中。结果就使民族自决的思想有从反对兼并政策的工具变成替兼并政策辩护的工具的危险。现在，这种糊涂观念可以说已经被克服了。列宁主义扩大了民族自决的概念，把它解释为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有完全分离的权利，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于是就排除了把自决权解释为自治权来替兼并政策辩护的可能。于是民族自决原则就由欺骗群众的工具（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它无疑是被社会沙文主义者用来做这种工具的）变成了揭露一切帝国主义野心和沙文主义阴谋的工具，变成了用国际主义精神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从前，通常都把被压迫民族问题看做纯粹法的问题。冠冕堂皇地宣布“民族的平等权利”，发表无数关于“民族平等”的宣言，——这就是第二国际各党所心满意足的事情。它们抹杀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当某一些民族（少数）靠剥削另一些民族生存的时候，所谓“民族平等”不过是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嘲弄。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法的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于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就成了支援，帮助，真正地经常地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成立独立国家的问题。

从前，通常都用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民族问题，把它看作一个单独的孤立的问题，看作和资本政权、推翻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总问题无关的问题。人们当时都默默地认为：欧洲无产阶级不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直接结成联盟也能取得胜利；民族殖民地问题可以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道，

可以不进行反帝的革命斗争，而悄悄地“自流地”得到解决。现在，这种反革命的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列宁主义已经证明，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也已经证实：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问题是这样：被压迫国家革命解放运动所含有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被压迫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含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推翻共同的敌人，用于推翻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发展的内幕、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可见，“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援助，必须坚决地积极地援助各被压迫民族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援助的。民族权利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服从整体，要求从整体的观点来观察。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拥护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运动，而反对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是“反动民族”，是欧洲的“俄国前哨”，是专制制度的前哨，而当时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却是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民族”。因为当时援助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就是间接援助欧洲革命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沙皇制度。

列宁说：“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义（现在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二六页）

关于个别的民族运动问题，关于这些运动可能具有的反动性问题（当然，如果不是从形式上，不是从抽象的法观点，而是从革命运动的利益的观点来具体地估量这些运动）就是这样。

关于一般民族运动的革命性也应该这样说。极大多数民族运动所无疑具有的革命性，也和某些个别的民族运动所可能具有的反动性一样，是相对的和独特的。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阿富汗的艾米尔为阿富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虽然阿富汗的艾米尔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可是象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列诺得尔和谢德曼、切尔诺夫和唐恩、韩德逊和克莱因斯这些“激烈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革命家”和共和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所进行的斗争却是反动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的结果是粉饰并巩固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取得胜利。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客观上也是革命的斗争，虽然埃及民族运动的首领是资产阶级出身，具有资产阶级身分，并反对社会主义；然而英国“工人”政府为保持埃及的附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却是反动的斗争，虽然这个政府的阁员是无产阶级出身，具有无产阶级身分，并“拥护”社会主义。更不必说其他较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印度和中国的民族运动了。这些国家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骤，即使违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就是说，毫无疑问是革命的步骤。

列宁说得对，在估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时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帝国主义斗争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就是说：“从世界范围来看，而不应当孤立地来看。”（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二六页）

(2)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主义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是从下列原理出发的：

（甲）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拥有金融资本并剥削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为数极少的文明民族的阵营，另一个是组成这个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阵营；

（乙）被金融资本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是帝国主义最巨大的后备力量 and 最重要的实力来源；

（丙）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反帝革命斗争是他们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唯一道路；

（丁）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已经走上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戊）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要求把这两种革命运动结合成一条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的战线；

（己）如果不建立并巩固共同的革命战线，那么发达的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就不能胜利，被压迫民族就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庚）如果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直接而坚决地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共同的革命战线，因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恩格斯）；

（辛）这种援助就是坚持、维护和实行下列口号：民族有分离权，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壬）不实行这个口号，就不能保证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和合作，而这种统一的世界经济是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物质基础；

（癸）这种联合只能是自愿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友爱的基础上产生的。

由此就产生了民族问题上的两个方面，即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在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地剥削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力求在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束缚而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另一个趋向是因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形成而产生的，它力求使各民族在经济上彼此接近。

列宁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

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十一页）

对于帝国主义，这两个趋向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如果不剥削殖民地，如果不用暴力把殖民地束缚在“统一的整体”范围内，就不

能生存；因为帝国主义只有靠兼并和夺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否则它根本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了。

对于共产主义，恰恰相反，这两个趋向不过是一个问题即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共产主义知道：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只有根据相互信任和自愿协定的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愿联合，只有经过使殖民地从“统一的”帝国主义“整体”分离出来的道路，经过使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才能达到。

因此，必须顽强地、不断地、坚决地反对各统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的“社会主义者”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些“社会主义者”不愿意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不愿意援助“他们的”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摆脱压迫、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以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以接近附属国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精神、以真正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的工人阶级。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前俄罗斯帝国内各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那么俄国革命就不会胜利，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也就不会被击溃。但是要取得这些民族的同情和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当时首先必须打断俄国帝国主义的锁链，使这些民族摆脱民族压迫。

不这样做，就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就不能树立真正的国际主义，就不能建立各民族合作的卓越组织，这个组织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是各民族将来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联合的实际榜样。

因此，必须反对各被压迫国家社会党人的民族闭关自守、狭隘观点和隔离状态，这些社会党人不愿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狭隘眼界，不了解本国解放运动和统治国无产阶级运动之间的联系。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保持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就不能保持它和统治国无产阶级在推翻共同的敌人、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阶级团结。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实现国际主义。

这就是以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道路。

请看列宁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以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的这个两方面的工作是怎样说的：

“这种教育工作……在压迫的大民族中和被压迫的小民族中，在兼并的民族中和被兼并的民族中，能够具体地相同吗？”

显然不能。要达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和进而融合为一的共同目的，显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体道路，就拿达到一张纸的中心点的方法来说吧，可以从纸的一端向左走，也可以从纸的相对的一端向右走，反正都会达到。如果压迫的、兼并的大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仅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记了，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廉、乔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兼并手段），忘记了尼古拉二世主张和加里西亚‘融合’、威廉二世主张和比利时‘融合’等等，那么，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是可笑的学理主义者，在实践上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压迫国家里，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必须是宣传并且要工人坚持被压迫国家有分离的自由。不这样，就没有国际主义。如果压迫民族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进行这种宣传，那么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鄙视他，把他看作帝国主义者，看作坏分子。这是绝对的要求，哪怕在社会主义未实现以前，分离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实现的’。……

相反地，小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以我们这个总公式——各民族‘自愿联合’的末尾两个字为其鼓动工作的重心。他既可以赞成本民族的政治独立，又可以赞成本民族加入邻近某个国家，同时又不违反他的作为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可是，他在任何场合都应当反对小民族的狭隘观点、闭关自守和隔离状态，而主张顾全整体和总体、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不仔细考虑问题的人，会以为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分离自由’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联合自由’是‘矛盾的’。可是，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要达到国际主义和民族融合这一目的，除了实行这个原理以外，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道路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三〇页至第三三二页）

七、战略和策略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六个问题：

（甲）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

（乙）革命的阶段和战略；

（丙）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

（丁）战略指导；

（戊）策略指导；

（己）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

（1）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第二国际统治时期主要是在比较和平发展的环境中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政治军队的时期。这是把议会制度当作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的时期。当时关于大规模的阶级冲突的问题、关于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搏斗的问题、关于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问题似乎都不是迫切的问题。当时的任务只是要利用一切合法的发展道路来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以适应无产阶级处于在野党地位并且似乎应当处于在野党地位的条件来利用议会制度。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时期和这样了解无产阶级任务的情况下，既不可能有完整的战略，也不可能周密的策略。当时只有关于策略和战略的一些片断的零碎的观念，但是没有策略和战略。

第二国际的滔天罪行并不在于它当时实行了利用议会斗争形式的策略，而在于它夸大了这种斗争形式的意义，几乎把这种斗争形式看作唯一的斗争形式。而当公开的革命搏斗时期到来的时候，当议会外斗争形式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迫切问题的时候，第二国际各党竟避开了新的任务，不去接受这些任务。

只有在下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公开发动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当推翻资产阶级的已经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问题（战略）已经成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当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议会形式和议会外形式（策略）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能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埋没了的那些关于策略和战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列宁发掘出来重见天日的。但是列宁并不限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策略原理。他还向前发展了这些原理，补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把这一切结合为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规则和指导原则的体系。列宁的《怎么办？》、《两种策略》、《帝国主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幼稚病》等书无疑是加进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武库的最宝贵的贡献。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科学。

(2)革命的阶段和战略。战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上的主要的打击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后备军）的相应的布置计划，在革命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

我们的革命已经过两个阶段，十月革命后已进入第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战略也有过变更。

第一个阶段。1903—1917年2月。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彻底消灭中世纪制度的残余。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农民。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力图抓住农民并用和沙皇制度**妥协**的方法来消灭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页）

第二个阶段。1917年3月—1917年10月。目的是推翻俄国的帝国主义，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贫苦农民。邻国无产阶级是可能的后备军。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危机是有利的时机。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民主派力图抓住劳动农民群众并用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方法来结束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页）

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十月革命后开始的。目的是在一国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运用这个专政作为据点，以便在世界各国推翻帝国主义。革命已经超出一国范围，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主要的后备军是发达的国家的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孤立第二国际各党，这些党是和帝国主义**妥协**这一政策的基本支柱。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运动联盟。

战略是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其后备军有关的。战略因革命由一个阶段转入另一阶段而变更，而在某一阶段的整个时期基本上是不变的。

(3)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策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运动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这个较短时期内的行动路线，就是通过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代替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以新的口号代替旧的口号，通过把这些形式配合起来等等来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战略的目的，比如说，是要取得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胜利，把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而策略的目的却没有这样重大，因为策略并不是要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战役、某些战斗的胜利，有成效地实行某些适合于革命某一高涨或低落时期的具体情况的运动和发动。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的，是服务于战略的。策略是随着来潮退潮而变更的。在革命第一阶段的时期内（1903—1917年2月），战略计划始终没有变更，策略却变更过几次。在1903—1905年的时期，党的策略是进攻的，因为当时革命处于来潮，运动是上升的，策略应当以这个事实为出发点。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适合于革命来潮的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政治总罢工、抵制杜马、起义和革命战斗口号就是这个时期内互相代替的斗争形式。当时的组织形式也因斗争形式的变更而变更了。工厂委员会、农民革命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比较公开的工人政党就是这个时期内的组织形式。

在1907—1912年的时期，党不得不转而采取退却的策略，因为当时革命运动低落，革命处于退潮，策略不能不估计到这个事实。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也变更了。不是抵制杜马，而是参加杜马；不是杜马外的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是杜马内的发动和杜马内的工作；不是政治总罢工，而是局部经济罢工，或者简直无声无息。当然，党在这个时期内应该转入地下活动，而群众的革命组织也就由文化教育组织、合作社组织、保险会组织以及其他合法组织代替了。

关于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也应该这样说，在这两个阶段中，策略变更过几十次，战略计划却始终没有变更。

策略是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有关的，是同这些形式的交替和配合有关的。策略在革命的某一阶段上可以随着革命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而变更好几次。

(4)战略指导。革命的后备军有两种：

直接的：（一）本国的农民以至所有过渡阶层，（二）邻国的无产阶级，（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四）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品和成果，而

无产阶级为了收买强大的敌人并取得喘息时机，可以在保持自己的实力优势的条件下暂时放弃一部分胜利品和成果；

间接的：（一）本国各个非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是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削弱敌人并加强自己的后备军的，（二）和无产阶级国家敌对的各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例如帝国主义战争），这些矛盾、冲突和战争是无产阶级在进攻时或者在被迫退却相机行事时可以利用的。

关于第一种后备军用不着多说，因为它们的意义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第二种后备军，因为它们的意义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很明显的，所以必须指出，它们有时候对于革命进程具有头等的意义。例如第一次革命时期和第一次革命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的巨大意义是未必可以否认的，因为这种冲突在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影响这件事情上无疑起了相当的作用。十月革命时期各主要帝国主义者集团之间进行决死的战争这一事实的巨大意义更是不可否认的，当时帝国主义者忙于相互之间的战争，没有可能集中力量来反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就有可能来切实地组织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准备扑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当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当它们彼此之间的新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这种后备军对于无产阶级一定会有愈益重大的意义。

战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运用这一切后备军来达到革命在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目的。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后备军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当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当进攻在以全力进行，当起义已经迫在眉睫，当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已经成为决定胜负的条件的时候，在这个决定关头，要把革命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党在1917年4—10月这一时期的战略可以说是这样运用后备军的实例。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是战争。毫无疑问，党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把广大群众集合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党在这个时期的战略就是通过游行示威来训练先锋队去进行街头的发动，同时通过后方的苏维埃和前线的士兵委员会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革命的结局表明，当时后备军是运用得正确的。

列宁在谈到革命力量的战略运用这个条件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的著名原理变动了一下说：

“（1）无论何时**不要把起义当做儿戏**，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把它进行到底**。

（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转入进攻**。
‘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抓住时机，趁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一小时）都必须力求获得胜利**，即使是小小的胜利也好，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五二页）

第二，要选择危机已经达到顶点、先锋队已经具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后备军已经具有援助先锋队的决心、敌人内部已经极端慌乱的时机作为实行致命打击的时机，开始起义的时机。

列宁说：决战时机可以说完全成熟了，如果“（1）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已经十分混乱，彼此之间的厮杀已经十分厉害，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十分疲惫”；如果“（2）一切犹豫的、动摇的、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自己，由于实际破产而大丢其丑”；如果“（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地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四页）

举行十月起义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模范。

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危险的错误，即所谓“失其速度”，就是说，党就会落在运动进程的后面，或者向前跑得太远，因而造成失败的危险。有一部分同志在1917年9月企图从逮捕民主会议〔注：民主会议，于1917年9月14—22日（公历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会议是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各社会主义政党、苏维埃、工

会、地方自治局、工商业界和军队中的妥协派代表。会上产生了临时政府的谘议机关——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利用它来制止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使俄国从苏维埃革命的道路转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上去。〕代表来开始起义，可以说是这种“失其速度”的例子，不善于选择起义时机的例子，因为当时在苏维埃内部还有动摇情绪，前线还犹豫不决，后备军还没有跟上先锋队。

第三，要越过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阻难和障碍，一往直前地实行既定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使先锋队不致失去斗争的基本目的，使群众不致迷失道路，而能向着这个目的前进并努力团结在先锋队的周围。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莫大的错误，即海员们所熟悉的所谓“失其方向”。我们党在紧接民主会议以后所采取的决定参加预备议会这一错误的步骤，可以说是这种“失其方向”的例子。当时党似乎忘记了预备议会是资产阶级企图把国家从苏维埃道路转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道路上去的手腕，党参加这种机关就会打乱全部计划，就会使那些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农迷失道路。这个错误因为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而被纠正了。

第四，当敌人力量强大，当退却不可避免，当接受敌人的挑战显然对自己不利，当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退却是使先锋队免受打击并保存其后备军的唯一手段的时候，要机动调度后备军来实行正确的退却。

列宁说：“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而且革命阶级已经从本身的沉痛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十一页至第十二页）

这种战略的目的就是要赢得时间，瓦解敌人，养精蓄锐，以便后来转为进攻。

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指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签订的条约。签订这个条约，是当时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采取的一种革命的妥协。按照这个和约，苏维埃俄国丧失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要付出巨额赔款。由于签订了和约，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时间，从而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并建立红军，为后来战胜白卫军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11月13日，即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签字后两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

布废除了布列斯特和约。〕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模范。这个和约使党有可能赢得时间，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冲突，瓦解敌人的力量，为自己保留农民，养精蓄锐准备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

当时列宁说：“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四〇七页）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过了三年，列宁说：“现在就连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页）

保证有正确的战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5)策略指导。策略指导是战略指导的一部分，是服从战略指导的任务和要求的。策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保证这些形式的正确运用，以便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取得为准备战略胜利所必需的最大成果。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要把这样一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提到第一位，这种形式最适合于当时运动的来潮或退潮的条件，能够促进和保证把群众引到革命阵地上，把千百万群众引到革命战线上，把群众配置在革命战线上。

问题并不是要使先锋队觉悟到保存旧制度的不可能和推翻旧制度的必不可免。问题是要使群众，使千百万群众了解这是必不可免的，使他们表示援助先锋的决心。可是，群众只有从亲身的经验中才能了解这一点。任务就是要使千百万群众有可能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到推翻旧政权的必不可免，要提出适当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使群众易于根据经验来认清革命口号的正确性。

如果党在当时没有决定参加杜马，如果它没有决定集中力量去进行杜马内的工作，并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去开展斗争，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杜马的无用、立宪民主党人的诺言的虚伪、和沙皇制度妥协的不可能、农民和工人阶级联盟的必不可免，那么先锋队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阶

级就会失去它和群众的联系。如果没有群众在杜马时期的经验，就不可能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召回主义〔注：召回主义，是俄国 1905—1907 年革命失败后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代表人物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等。召回派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拒绝参加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放弃一切合法斗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幌子，执行了取消派的路线。列宁把召回派叫作“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1909 年 6 月，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全体会议）斥责了召回派，把波格丹诺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策略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先锋队脱离自己的千百万人的后备军。

如果无产阶级当时跟着在 1917 年 4 月号召举行起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注：这里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中以谢·亚·帕格达季耶夫为首的少数委员。他们在 1917 年四月游行示威时提出了立刻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游行示威的次日（4 月 22 日）通过列宁提出的决议，严厉地谴责了帕格达季耶夫等人的冒险主义行为，认为他们提出的口号不合适、不正确，妨碍党把苏维埃的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同当时党的方针相抵触。〕走，那么党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在广大的农民和士兵群众中的影响，因为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暴露自己是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拥护者，因为当时群众还没有根据自身的经验认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关于和平、土地和自由的言论的虚伪。如果没有群众在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的经验，就不会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陷于孤立，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耐心说明”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并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公开斗争的策略是当时唯一正确的策略。

“左派”共产主义者策略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变成一小撮徒托空言而没有基础的密谋家。

列宁说：“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态度……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压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现在这个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也得到

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证实。不仅对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对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需要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注：卡普（1868——1922）是德国1920年反革命政变——“卡普盲动”的主要领导者，政变后成为政府首领，他的政府仅存在数日即被德国工人的总罢工推翻。〕之流）的专政，然后才坚决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

第二，要在每个一定的时机找出事变过程链条上的特殊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就能掌握整个链条，为取得战略胜利准备条件。

问题是要从摆在党面前的许多任务中挑出这样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中心，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顺利地解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的意义，一个例子可以引自很久以前的时期（党形成时期），另一个例子可以引自我们最接近的目前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

在党形成的时期，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还没有彼此联系起来，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从上到下腐蚀着党，思想上的混乱是党内生活的特征，——在这个时期，整个链条中的基本环节和摆在党面前的各项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创办全俄的秘密报纸（《火星报》）。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全俄的秘密报纸才能形成党内意见一致的核心，才能把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联结成一个整体，准备思想统一和策略统一的条件，从而为真正的党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由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的时期，工业遭到破坏而奄奄一息，农业苦于城市产品的不足，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已经成为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在这个时期，事变过程链条中的基本环节，许多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商业。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工业和农民经济只有通过商业才能结合；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有生产而没有销路就是置工业于死地；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商业去扩大销路，才能扩展工业；因为只有商业方面巩固了，只有掌握了商业，只有掌握了这个环节，才能指望把工业和农民市场结合起来并顺利地解决其他的当前任务，以便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创造条件。

列宁说：“仅仅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甚至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那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坚定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

“当前……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件的链条中，即在 1921—1922 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八十八页、第八十九页）

保证有正确的策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6)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革命的策略和改良主义的策略有什么区别呢？

有些人以为列宁主义反对一切改良，反对一切通融和妥协。这是完全不对的。布尔什维克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地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来，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种条件下，改良，其中包括通融和妥协，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列宁说：“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象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吗？”（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一页）

问题显然不在于改良或通融和妥协，而在于怎样运用改良和妥协。

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过是拿来作谈话资料、借以转移视线的小事情。所以，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必然要变为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瓦解革命的工具。

相反地，在革命者看来，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者看来，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自然会变为瓦解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巩固革命的工具，变为向前发展革命运动的据点。

革命者采用改良，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挂钩来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结起来，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掩蔽物来加强秘密工作，以使用革命精神训练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和妥协的实质就在这里。

相反地，改良主义者采用改良，是为了拒绝任何秘密工作，破坏训练群众去进行革命的事业，在“恩赐的”改良的福荫下高枕而卧。

改良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这里。

关于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改良和妥协的问题就是这样。

可是在帝国主义被推翻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情形就有些改变了。在某种条件下，在某种环境中，无产阶级政权也许不得不暂时离开用革命手段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而走上逐渐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走上”列宁在《论黄金的作用》¹⁹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那条“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上迂回行进的道路，走上改良和向非无产者阶级让步的道路，以便瓦解这些阶级，给革命以喘息时机，养精蓄锐，准备举行新进攻的条件。不能否认，这条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只是应当记住，这里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改良是来自无产阶级政权方面的改良，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它给无产阶级政权以必要的喘息时机，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无产者阶级。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改良就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

无产阶级政权所以能够实行这种政策，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前一时期的革命规模已十分广大，因而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场所，因而可以实行退却，用暂时退却的策略，用迂回行进的策略来代替进攻的策略。

这样看来，从前，在资产阶级政权下，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而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良的来源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品，即由这些胜利品构成的、积累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后备力量。

列宁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只能从一方面，即只能从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取得稍微巩固、稍微持久的初次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关系的基

¹⁹ 见弗·伊·列宁的著作“论金子在现时以及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八十五页至第九十二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九一一页至第九一九页）。

础就是把改良看作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无产阶级即使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也还会产生一种新的内容。在原则上虽然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却已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这种变化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取得胜利以后，如果取得胜利的国家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其实力显然不够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么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副产品”）还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使我们即使在被迫退却时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九十一页至第九十二页）

八、党

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力量，议会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来在公开的革命搏斗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重大的和决定的意义。考茨基在第二国际遭受攻击时替它辩护说：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期，就没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们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议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谈不到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公开的阶级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要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去教育工人，要训练后备军并使他们跟上来，要和邻国的无产者结成联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如此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以用那些在议会制度的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使自己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必

不可免的失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而仍然以旧的政党为领导，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装。几乎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随机应变的本领，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这一切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

这个新的党有什么特点呢？

(1)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首先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都吸收进来。但是要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队，党应当用革命理论，用运动规律的知识，用革命规律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否则它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如果党只限于记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感觉和思想，如果它做了自发运动的尾巴，如果它不善于克服自发运动的因循习惯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如果它不善于超出无产阶级的一时的利益，如果它不善于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那么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党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应当比工人阶级看得远些，应当引导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做自发运动的尾巴。鼓吹“尾巴主义”的第二国际各党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传播者，而这个政策是要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只有采取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观点、能够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党才能使工人阶级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使它变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工人阶级斗争的困难，说到斗争环境的复杂，说到战略和策略，说到后备军和机动性，说到进攻和退却。这些条件的复杂程度，和战争条件比较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谁能认清这些条件呢？谁能给千百万无产者群众以正确的方针呢？无论哪一个作战部队如果不愿意遭到失败，就非有经验丰富的司令部不可。无产阶级如果不愿意让自己受死敌的宰割，就更加非有这样的司令部不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可是这个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呢？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党才能成为这样的司令部。工人阶级没有革命的党，就等于军队没有司令部。

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

可是，党不能仅仅是**先进**部队。党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部队，即本阶级的一部分，党应当和本阶级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只要无产阶级还由其他阶级出身的人来补充，只要工人阶级还不可能全部提高到先进部队的水平，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和其余群众之间的区别，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区别是不会消灭的。可是，如果这个区别变成了隔离，如果党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而和非党群众脱离，那么党就不成其为党了。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联系，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结合，如果非党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如果党在群众中没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信用，那么党就不能领导阶级。

不久以前，我们党从工人中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些人与其说是自己走进党内来的，不如说是被其余的一切非党群众送进党内来的，这些非党群众积极参加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而且接收新党员都是经过他们赞同的。这件事说明：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把我们党看做他们**自己的党**，看做**亲近的亲切的党**，他们深切关心党的发展和巩固，他们自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党的领导。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精神上的线索把党和非党群众联系起来，党是不能成为本阶级的决定力量的。

党是工人阶级的不可分离的部分。

列宁说：“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完全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注：马尼洛夫是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游手好闲、痴心妄想、阿谀逢迎和虚假伪善的地主。马尼洛夫精神是想入非非的意思。——第 100、263 页。〕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二四〇页）

(2)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如果党想真正领导本阶级的斗争，那么它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党的任务是非常巨大而繁杂的。党应当在国内外发展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党应当在环境要求进攻时引导无产阶级去进攻；党应当在环境要求退却时带领无产阶级避开强大的敌人的打击；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没有这些条件，就谈不到党对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领导。

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

关于党是有组织的整体这个思想，是在列宁所提出的我们党章第一条的著名条文中固定下来的，这个条文把党看做组织的总和，把党员看做党内某一组织的成员。孟什维克还在 1903 年就反对这个条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名入党的“制度”，要求把党员的“称号”扩大到每个“教授”和“中学生”，每个“同情者”和“罢工者”，即扩大到每个给党以某种援助、但是并不加入而且不愿加入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人。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这个奇特的“制度”在我们党内巩固起来，那就必然会使党内充满教授和中学生，使党变成一个界限模糊、没有定形、组织涣散而沉没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机构”，抹杀党和阶级间的界限，抛弃党把无组织群众提高到先进部队水平的任务。不用说，在这种机会主义的“制度”下，我们党是能够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现工人阶级的组织核心的作用的。

列宁说：“在马尔托夫同志看来，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不过是使‘称号’广泛散布而已。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涣散组织的思想。”（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二四六页）

可是，党不仅是党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党同时还是这些组织的统一的体系，是这些组织正式结成的统一的整体，有上级的和下级的领导机关，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全体党员所必须执行的实际决议。没有这些条件，党就不能成为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

列宁说：“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

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同上，第三三八页至第三三九页）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的工作由中央来领导的原则，往往引起那些不坚定的分子的攻击，他们斥责这种原则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不实行这些原则，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党的有计划的工作和对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就会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在组织问题上始终是终一贯地实行这些原则的。列宁把反对这些原则的行为叫做“俄国的虚无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认为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讥笑和痛斥。

列宁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对于这些不坚定的分子是这样说的：

“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他们一听见有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瞧不起人的样子，发表鄙视的……意见，说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看来很明显，高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要掩盖他们对于中央机关人选的不满，不过是要掩盖……丑恶行为。你是官僚主义者，因为你是代表大会不按照我的意志而违反我的意志委派的；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是根据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你做事极端机械，因为你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的’多数，而不考虑到我想得到补选席位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柄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这里所说的“伙伴”指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等人，他们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责备列宁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约·斯大林注〕。”

(3)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可是，党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许多为顺利地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所绝对必需的组织，如工会、合作社、工厂组织、议会党团、非党妇女团体、出版机关、文化教育组织、青年团、革命战斗组织（在公开的革命发动时期）以及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代表苏维埃（当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时）等等。这些组织极大多数都是非党的，其中只有某一部分直接接近党或者是党的支脉。所有这些组织，在某种条件下都是工人阶级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各种斗争中的阶级阵地；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锻炼无产阶级这个负有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产阶级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既然有这样多的组织，怎样实现统一的领

导呢？怎样才能保证在领导工作中不致因为有很多组织而发生各自为政的现象呢？有人会说，这些组织各在自己的特别范围内进行工作，因此不会互相妨碍。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还有一点也是对的，即所有这些组织都应当按照一个方向进行工作，因为它们都是为一个阶级，即为无产者阶级服务的。试问：谁来决定这一切组织在进行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即总方向呢？哪里有这样一个中央组织，它不仅因为必要的经验而能制定这条总路线，并且因为有充分的威信而能推动这一切组织去实现这条路线，以达到领导上的统一，排除发生不协调现象的可能呢？

这样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的党。

党具备为此所必需的一切条件，第一，因为党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这些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非党组织有直接联系，并经常领导它们；第二，因为党既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所以它是培养能够领导本阶级各种组织的工人阶级领导者的最好的学校；第三，因为党既是培养工人阶级领导者的最好的学校，所以按其经验和威信来说，它是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集中起来的唯一组织，因而也就是能把工人阶级所有一切非党组织都变成使党同本阶级联结起来的服务机关和引带的唯一组织。

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这当然不是说，非党组织，如工会、合作社等等，应该正式服从党的领导。这只是说，参加这些组织的党员，这些无疑是有威信的人，应该采取一切说服办法，使这些非党组织在自己的工作中跟无产阶级政党接近，并自愿接受这个党的政治领导。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它的政治领导应当普及到无产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中去。（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二页）

正因为如此，主张非党组织“独立”和“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繁殖出**独立的**议员和**脱离**党的出版家、**狭隘的**工会活动家和**市侩化的**合作社运动者的机会主义理论，是和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完全不能相容的。

(4)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者阶级内部和无产者阶级各个组织中的主要的领导基础。可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把党看做目的本身，看做独立自主的力量。党不仅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而且又是无产阶级手中**用来**争得专政（当无产阶级还没有争得专政时）、**用来**巩固并扩大专政（当无产阶级已经争得专政时）的

工具。如果政权问题没有摆在无产阶级的面前，如果帝国主义的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以及危机的存在没有要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集中到一点，把革命运动的一切线索集中在一个地方，以便推翻资产阶级而争得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党的作用就不能提得这样高，党就不能超过无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首先因为党是无产阶级顺利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战斗司令部。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把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在斗争进程中把整个运动的领导都集中起来的党，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专政。

可是，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列宁说：“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页）

可是，“保持”和“扩大”专政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向千百万无产者群众灌注纪律性和组织性；这就是说，要在无产者群众中间造成能够防御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腐蚀影响的屏障和堡垒；这就是说，要加强无产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方面的组织工作；这就是说，要帮助无产者群众把自己教育成为能够消灭阶级并准备条件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力量。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纪律性而强有力的党，要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七页）

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就是为了争得和保持专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随着阶级的消灭，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党也一定会消亡。

(5)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而强有力的党，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没有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全体党员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党内铁的纪律是不可思议的。这当然不是说，因此就排斥了党内争论的可能。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党内的批评和争论，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更不是说，纪律应当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自觉自愿的服从，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成为真正铁的纪律。可是，在争论已经结束，批评已经完结，决议已经通过以后，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是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无论是统一的党还是党内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设想的。

列宁说：“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八五页）

在争得专政以前的斗争条件下党内纪律的问题就是这样。

关于争得专政以后的党内纪律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样说。

列宁说：“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同上，第二十七页）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几乎用不着证明，有派别组织就会产生几个中央；有几个中央就是表明党内没有共同的中央，就是分散统一的意志，就是削弱和破坏纪律，就是削弱和破坏专政。第二国际各党既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愿意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当然可以容许自己有派别组织自由这种自由主义，因为它们根本就不需要铁的纪律。可是，共产国际各党既然把争得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就不能容许“自由主义”，也不能容许派别组织自由。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排斥任何派别活动和党内权力分散现象的。

因此，列宁“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出发”来说明“派别活动的……危险性”，这个说明已经载入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注：俄国共产党（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有：中央的总结报告、民族问题、工会问题、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问题、党的建设问题、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问题等。列宁在大会上作了中央的政治报告、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关于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大会作了关于工会问题争论的总结，严厉谴责了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机会主义派别的观点，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列宁的工会问题纲领。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要求立即解散一切派别集团，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斯大林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并代表民族问题委员会提出了相应的决议草案，为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专门决议²⁰中。

因此，列宁要求“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并“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否则就给以“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的处分。（见《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6)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是党内派别活动的来源。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和外界隔绝的阶级。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出身的那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无产阶级化的人不断地流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同时，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又正在腐化，他们多半是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得来的超额利润所豢养的工会活动家和议员。列宁说：“这个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了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

²⁰ “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由弗·伊·列宁起草，经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至十六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一七页至第二二〇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八二一页至第八二四页，并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五二七页至第五三〇页）

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代理人……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八二页）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用种种方法钻进党内，把动摇和机会主义的情绪，把腐化和犹疑的情绪带到党内来。他们是派别活动和瓦解现象的主要来源，是涣散党和从内部破坏党的现象的主要来源。后方有这样的“同盟者”而去和帝国主义作战，就会受到两面夹攻，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因此，对这种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把他们驱逐出党，是顺利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决条件。

主张用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来“战胜”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主张在一个党的范围内来“消除”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是一种腐朽而危险的理论，它有使党麻痹和害慢性病的危险，有使党被机会主义宰割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丧失革命政党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丧失主要武器的危险。如果我们党在自己的队伍里有马尔托夫之流和唐恩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和阿克雪里罗得之流，那么我们党就不能走上大道，就不能取得政权和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么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列宁说：“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具体证实了的。……在俄国……曾经有很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那么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的。大家都承认，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家政权，就要进行决战……在这样的时候，不仅把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屠拉梯分子驱逐出党是绝对必要的，甚至把那些会动摇和正在动摇的、要去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从各个重要岗位上撤下来，也可以说是有益的。……在革命的前夜和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进行最激烈的斗争的时候，党内的最小的动摇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坏革命，都能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因为这个政权还没有巩固，因为对这个政权的攻击还非常猛烈。如果动摇的领袖在这样的时候离开，那么这不

会削弱而会加强党，加强工人运动，加强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五七页、第三五八页、第三五九页）

九、工作作风

这里所指的不是文风。我指的是工作作风，是列宁主义实践中能够造就特种类型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那种特殊和独特的要素。列宁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的.school，它能培养特种类型的党的工作者和国家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这种作风的特征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怎样的呢？

它的特点有两个：

（甲）俄国人的革命胆略；

（乙）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列宁主义的作风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这两个特点的结合。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消除因循习惯、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以及对古老传统的盲从态度的药剂。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能激发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事物，开辟前途。没有这种革命胆略，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可是，如果不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那么它在实践中就很可能堕落为空洞的“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这种堕落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谁不知道“革命的”臆造和“革命的”设计这种病症的根源就是相信法令能安排一切和改造一切呢？有一位俄国作家伊·爱伦堡在他的《共产主义的完人》这篇小说中描写过一个患有这种病症的“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立意拟定一个理想的完人的模式……结果竟在这个“工作”中“淹死了”。这篇小说虽然有过于夸大的地方，它正确地抓住了这种病症却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谁都没有象列宁那样苛刻无情地讥笑过患有这种病症的人。他把这种迷信臆造和发号施令的病症鄙视为“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

列宁说：“所谓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就是说，一个置身于共产党内而还没有被清洗出去的人，以为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就能完成他的一切任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五十四页）

列宁通常总是用日常平凡的事情来和这种“革命的”高调相对立，以此着重指出：“革命的”臆造是和真正列宁主义的精神与字句绝对相反的。

列宁说：“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九五页和第三八六页）

相反地，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却是消除“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和虚幻的臆造的药剂。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哪怕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没有这种力量，就不可能有认真的建设工作。

可是，如果不把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结合起来，那么它就很可能堕落为狭隘的无原则的事务主义。谁不知道狭隘的实际主义和无原则的事务主义的病症往往使某些“布尔什维克”蜕化而脱离革命事业呢？波·皮尔尼亚克的《荒凉年份》这篇小说反映过这种特殊的病症，描写过某些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们充满了意志和实践的决心，“干得”很“起劲”，可是看不见前途，不知道“干工作是为了什么”，因而离开了革命工作的道路。谁都没有象列宁那样辛辣地讥笑过这种事务主义的病症。列宁把这种病症鄙视为“狭隘的实际主义”，“无头脑的事务主义”。他通常总是用生动的革命事业和我们全部日常工作中所必须具有的革命前途来和这种病症相对立，从而着重指出：无原则的事务主义，也同“革命的”臆造一样，是和真正的列宁主义绝对相反的。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

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完整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典型，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约·斯大林

载于1924年4月26、30日

和5月9、11、14、15、18日

《真理报》第96、97、103、

105、107、108、111号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国际关系和国内建设的新经验，作出了关于坚定地执行列宁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可以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苏维埃的民主制度、贯彻遵守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批判党内的缺点、规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等等一系列的重大决定。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会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在过去历史上，在现在一切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当权政党员群众面前，在人民群众面前，认真地揭露自己的严重错误。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党，对于它们说来，实行自我批评，除了失掉错误以外，什么都不会失掉，而所得至的却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兴高采烈地谈论苏联共产党关于个人崇拜的自我批评。他们说：好！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共产党居然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还是一个有很大声名和荣誉的领导人物斯大林犯了这样的错误。反动派以为他们现在是抓住了一个能够用来中伤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支部的把柄了。可是，反动派里毕竟“心劳日拙”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什么样著作中曾经说过我们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或者曾经说过某一个共产党支部人是绝对不会犯错误呢？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支部内生活所以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否认有什么不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的“神人”吗？何况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

一九二一年十月间，列宁说过：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走狗和瘟猪们，用层出不穷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责难我们所建设的我国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工作中的失利和错误，无论过去或现在，确实是很多的，在这样的全世界历史上的新奇事业，即创立空前未见的新式国家制度中，难道能够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将百折不回地来为纠正我们的失利和错误而奋斗，力求改善我们实际运用苏维埃原则这方面还未完善的方法。”也不可能设想：初期有过某些错误，就将命定地永远不会再犯某些其它的错误。自从人类社会裂为几个利害不同的阶级以来，经历过奴隶主的专政，封建主的专政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些专政继续了几千年：而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人类才开始经历无产阶级的专政。前三个专政都是剥削阶级的专政，但是封建主的专政比奴隶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资产阶级的专政，但封建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这些在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总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犯过无数历史性的错误，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才能积累他们的统治经验。但是随着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错误，激起被压迫阶级的大规模反抗和他们自己内部的分崩离析，以至促进了自己的灭亡。

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一——也不能不犯很多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为着战胜强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当着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调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错误。这一点，也是人们所完全能够理解的。

可是，无论有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列宁说得很对：“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看，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做了大量的蠢事；那我就想这样来回答他们：对的，但是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的蠢处较之你们说来，终究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剥削阶级为了掠夺的目的，总是希望使他们的专政能够永远保持下去，由一世传到万世，

因而用尽千方百计来折磨人民，他们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但是无产阶级为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解放人民的目的，却是要利用自己的专政条件，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大同，让自己的专政逐步地消逝下去，因而就要尽量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而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无限发挥的可能性，也就包含着克服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所犯各种错误的可能性。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

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迅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在苏维埃联盟的形式下形成了国内多民族的巩固的联盟，苏联国内原来落后的民族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挽救了欧洲的文明，并且帮助东方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切灿烂的成就，给全人类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大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使苏联在全世界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中成为第一个坚强的堡垒。使苏联鼓舞和支持了所有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鼓舞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和一切争取人类进步的运动。这些都是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伟大业绩。给予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指出创造这种伟大业绩的道路的，是列宁。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他们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

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用权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但是，当着斯大林正确地运用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荣誉的时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就是完全错误。但是，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支部和群众之上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和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用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上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决定。

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仅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就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即使剥削阶级消灭了，小生产经济已经由集体经济所代替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但是旧社

会的腐朽的、带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残余，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保存下来。“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既然在社会中还有着，也就有可能给予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以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物也受了这种影响。个人崇拜是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的再影响给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党的生活，日益和个人崇拜这类精神状态互相矛盾着，互相冲突着。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

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现象，都将是必然继续发生的，否则，社会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有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还存在着，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这样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个人和集体的矛盾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而任何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如果脱离集体领导，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实际生活，他们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思想硬化起来，以致做出严重的错误。对于我们必须警惕的，就是：有些人当他们因为党和国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绩，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的时候，便有可能利用这种群众的信任去滥用权威，做出一些错

事来。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的胜利和成就。中国革命的经验同样证明：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能，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才使我们党不论在革命时期或者在国家建设时期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就。中国共产党过去在革命队伍中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毫无疑问，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为了反对个人主义的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曾经作出了一个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现在说到有关党的集体领导问题的时候，提一下这个决定，对于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它的一切领导人员说来，将仍然是有好处的。这个决定写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与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长时期以来，在我们党内，对于这样的领导方法，曾经给它起了一个通俗的名称，叫做“群众路线”。我们工作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凡是遵守这条路线的，工作总是好的或者较好的，即使犯了错误，也易于改正；凡是违背这条路线的，工作总是遇到挫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路线。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工人阶级和其它人民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赢得革命，赢得国家政权，而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开拓无限广阔的道路。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政治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近些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这里必须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必须认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特别是他关于保卫列宁主义和正确地总结苏联建设经验的许多著作，我们都需要当做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接受过来，不这样做，就是错误的。但是，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有些人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看待斯大林的著作，结果是不能分析其中的正确方面和不正确方面，就是对于其中的正确内容，也是当作万应灵药，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例如斯大林这个公式，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点有分别地看待它。

在某种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可以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都是正确的。按照我们的经验。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应该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对于中间势力，则应该采用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并且应该力求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它从中立的地位转变过来，使它和我们成立联盟，以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可是，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一些同志简单地搬用斯大林的这个公式到中国革命中来，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中间势力，把它说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没有孤立真正的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使自己吃了亏，而有利于真正的敌人鉴于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

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实践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方针是适合于中国革命的情况的，是正确的。

事实总是这样：教条主义只是思想懒汉才会加以欣赏的东西，它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等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它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我们应该继续地总结这些经验。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的。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个别的、局部的和初步出现的错误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犯严重错误的经验。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〇年发生的，后者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在这个时期布什，在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里还发生了同党的中央相对抗的反党支部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严重地损害了一部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上述两个时期内所犯的错误，除了张国焘路线是属于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以外，都是全国性的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我们党吸取了以前两个革命时期的教训，没有让这条错误路线发展下去，这条错误路线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我们党的中央所纠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

和个别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能和人民群众的智能，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党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错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了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多年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或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下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

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误。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问，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间，我们曾经就斯大林问题讨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那个时候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发生了一系列引起我国人民关切的事件，铁托同志在十一月十一日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对于这篇演说的评论，在我国报纸发表以后，再一次使人们提出了许多需要加以答复的问题。我们现在这篇文章将着重地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就是：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在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就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全世界人民力量之间的对立。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痛苦的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帝国主义从来就反对各国人民的解放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从来就把最坚决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眼中钉。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世以来，帝国主义就用尽一切手段来危害苏联。在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后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它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明目张胆的破坏活动，更成为世界政治中异常显著的现象。帝国主义阵营的首脑美国，在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方面，作得特别凶恶无耻。它多年来阻挠着我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多年来公开地把颠覆东欧各国作为政府的政策。

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有不正确的，面貌一新 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美帝国主义尽管利用英法侵埃战争的失败，竭力企图夺取英法在中东北非的利益，但是还是声明保证同英法消除“误会”，取得“更密切更亲密的谅解”，以便重整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亚非人民和反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统一战线。为了

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所说的“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必须有一套生活和行动的哲学”的主要含义。杜勒斯多少带着醉意地断言：“苏联共产党结构正处于恶状态（？），而统治者的权力正在崩溃（？）面对着这种形势，自由国家必须保持道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破坏苏联—中国共产主义体系，有助于保持军事实力和决心。”他号召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搞垮以军国主义（？）和无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苏联强有力的专制政治（？），并且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教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他尽可以污蔑我们一千次，诅咒我们一万次，这毫无什么新奇之处。但是他从“哲学”上要求帝国主义世界把对于共产主义矛盾放在其它一切矛盾之上，一切都为了“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破坏”和“搞垮”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体系这对于他们虽然肯定是徒劳的，对于我们却给予了十分有益的教训。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

间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开始谈到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前，我们认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根本立场问题。否则，我们就必然会迷失方向，就不可能于国际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

帝国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攻击，长期以来，主要地集中于苏联。而最近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论，也大都同对于苏联的认识有关。因此，正确地估计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但是，除了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自看到过他们所毕生努力争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一九一七年胜利地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又胜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从此由理论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但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苏联在革命以后的三十九年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苏联消灭了经济生活中无政府状态，危机和失业。苏联的经济和文化，以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它的工业总产量，在一九五六年已经达到革命以前最高年份一九一三年的三十倍。革命以前工业落后、文盲众多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拥有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和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苏联劳动人民由革命前的被压迫者变成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他们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劳动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本来是国内各民族的牢狱，而在十月革命以后，这些民族却得到了平等的地位，迅速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民族。

苏联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苏联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受到了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早期的苏联，经历过内战、饥荒、经济困难、党内宗派分裂活动的严重的折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的时间内，在

西方国家开辟第二战场以前，苏联曾经独力承受了并且击败了希特勒和他的伙伴们的几百万军队的进攻。这些严酷的考验没有压倒苏联，没有阻止它的前进。

苏联的存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而给予一切革命的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以无限的希望、信心和勇气。各国劳动人民援助了苏联，苏联也援助了各国劳动人民。苏联执行了维护世界和平、承认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外交政策。苏联是在世界范围内战胜法西斯侵略的主力。英勇的苏联军队同有关各国的人民力量合作，解放了东欧各国和中欧的一部、中国的东北部和朝鲜的北部。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援助了这些国家经济建设，并且同它们在一起组成了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运动，对于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亚非地区的许多和平国家，苏联也给予了重大的支持。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人们早已经知道了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再一次提起这些事情呢？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敌人固然一贯地抹煞这一切，而现在有些共产主义者在探讨苏联经验的时候，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事情的次要方面，而忽视了事情的主要方面。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苏联由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更难以避免。这些错误和失败，对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是有极其有益的教训。因此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苏联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什么是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呢？据我们看来，至少以下这一些经验具有基本的性质：

（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

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2) 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3) 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4)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5)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除了有共同的方面，还有不同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去讨论。但是从基本原理上说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

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团结无产阶级，团结人民群众，坚决地击退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世界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人们问道：既然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正确的，为什么又发生斯大林的错误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四月间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了。但是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它有关情况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把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作一些进一步的申述。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它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取得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上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都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许多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肃清反革命的问题上和对某些外国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方面，总的来说，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援助了各国人民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的。但是，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却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谈不到教育广大干部采取谦虚

的态度；有时他甚至错误地干涉某些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因而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

对于斯大林的这些严重的错误应该怎样解释呢？这些错误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科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谁要抵抗这种变革，谁说会被历史所抛弃。这一规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这就是说，也适用于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斯大林的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当然不是如此。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年轻的，它所起过的时间还不到四十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

但是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

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调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质的矛盾（按照辩证法，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证不发生错误了呢？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

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为了解决以上的所说的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的考验，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也是不会有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就是在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中，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也还有缺陷，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还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当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的主观认识，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观实际。因此，在他们的工作中，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严格遵守并且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只要彻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认真地依靠群众，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却是可以避免的。

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错误之所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长期性的、严重的错误，而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正是因为他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会受到某种破坏，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的条件。这就是：党在领导国家方面还缺乏经验；新的制度还没有巩固到足以抵抗一切旧时代影响的侵袭（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都不是直线的，它们的某种波浪式的起伏现象，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是屡见不鲜的）；国内外的紧张斗争于某些民主发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但是仅仅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错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却没有犯斯大林这样的错误。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主观主义。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能和权威，不肯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客观实际情况。而且，他往往在一个长时间内固执地要推行这些错误的东西，而不能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为了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消除这些错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已经采取了步骤，并且已经开始取得了成就。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圆满成功。很明显，由于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一个短时间的错误，这个错误的纠正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得到完全胜利，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努力，需要细致的思想工作。我们相信，曾经克服过无数困难的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必将克服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

苏联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纠正错误的斗争，当然不会从西方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支持。他们为了乘机抹煞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抹煞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过去时期的巨大的成就，为了乘机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硬把对于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叫作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叫作所谓“反斯大林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他们的恶意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不幸，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间，也在那里传播着类似的说法。我们以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

大家知道，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的一生乃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他在青年时代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在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以后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而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为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而斗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为建成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斗争。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无论如何，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而且也说明了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的和错误。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

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对待斯大林以及一切在他的影响下犯了类似错误的同志，才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他们的错误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认识的根源。这种错误既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可以在某些别的同志身上发生。因此，在认识和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否则，如果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其它领导同志在最近的言论中，对于斯大林错误和其它有关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据我们看来，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过去时期内，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困难条件下，作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可贵的努力。他们在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的试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中国人民欢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同志取得和解，欢迎中南两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并且同南斯拉夫人民一样希望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日益繁荣和强盛。我们也同意铁托同志这次演说中的一些论点，例如对于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谴责，对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支持，对于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的谴责，对于法国社会党采取侵略政策的谴责。但是使我们惊异的是，他在演说中对于几乎所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共产党都进行了攻击。铁托同志断定，“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各国党内设法继续保持他们的职位，他们再一次望巩固他们的统治，把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的人民的头上，甚至别国人民的头上”。因此，他宣称“我们必须同波兰同志们一起来反对其它国家的——无论东方国家的或西方国家的——党内出现的那种倾向。”我们没有看到过波兰党的领导同志的这些意见，我们觉得必须说，他把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等等作为攻击的对

象并且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路线和所谓“斯大林主义路线”哪一个得胜的问题，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这只能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

铁托同志正确地指出：“从将来是社会主义还是反革命这样的角度来看匈牙利目前的发展，我们必须保卫卡达尔的现政府，我们必须帮助它。”但是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同志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上关于匈牙利问题的长篇演说，却很难说不是对于匈牙利事件作了一种完全不分敌我的解释，而且要求匈牙利的同志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要求他们把全部政权交给布达佩斯的和其它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不管工人委员会成了什么样子”；要求他们“不必在恢复共产党方面枉费心机”，“因为对群众来说，这样的党是官僚专制的化身”。这就是卡德尔同志给兄弟国家所设计的“非斯大林主义路线”的一个标本。匈牙利的同志们拒绝了卡德尔同志的这个建议。他们解散了被反革命分子所操纵的布达佩斯和其它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坚持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我们认为，匈牙利的同志们是作得完全正确的。否则匈牙利的将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革命。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显然是作得太过分了。即令他们对于兄弟党的批评有某些合理的部分，但是他们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都违背了同志式讨论的原则。我们不愿意干预南斯拉夫的内部事务，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内部事务。为了巩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为了不给敌人在我们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的条件，我们不能不向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提出兄弟般的劝告。

三

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

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而且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创造出自己的新的经验，从而给别的民族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作出一定的贡献。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既然是各国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当然不能不重视运用先进国家经验的问题。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说过：“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根本上就是国际的。这不仅是说我们应当反对本国沙文主义，而且是说在年轻国家内刚刚开始的运动，只有在它运用别国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列宁在这里是说俄国刚刚开始的工作运动必须运用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苏联经验的问题上，他的这个观点也是适用的。

但是学习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如前所说，苏联的经验中还有错误的、失败的部分。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反之，如果不加分析地原样照抄，那么，在苏联成功了的经验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造成失败，更不要说失败的经验了。列宁在我们上文所引用的话下面紧接着说：“但是，要真能运用别国经验，单单认识这种经验或单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善于用批评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独立地检查它。谁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发展和散播到了如何广大的地步，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该要有多少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显然，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问题比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更要复杂许多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了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

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路线，我们的党现在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一些错误。也由于这样，我们能够充分了解目前波兰和匈牙利的同志纠正过去时期教条主义错误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纠正的。我们将继续努力纠正和防止在我们工作中的这类错误。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有它的民族特点。但是这决不是说，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没有基本的共同点，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在我们国内和国外，都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

由于斯大林和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时期领导者犯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错误，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专政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亦即社会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强有力，所以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而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对剥削者的专政、大多数人的专政，因为它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现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实现的民主。离开了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离开了他们的积极支持，就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至少不可能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愈是紧张，无产阶级愈是需要采取最坚决最彻底的态度，依靠边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来战胜反革命力量。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和紧接着的国内战争时期“热火朝天”的群众斗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我们党所常说的“群众路线”，也就是从苏联当时的经验学来的。苏联当时的紧张斗争，基本上依靠着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当然不可能具备完善的民主程序。到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力量已经基本上肃清以后，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对于国内的反革命残余（这种残余在帝国主义存在期间不可能完全肃清）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它的主要锋芒就应该转向防御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种条件下，当然应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

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关系。斯大林不是这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发展。苏联共产党坚决地纠正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这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民主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发展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发展他们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的积极性。因此，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有些人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反应，最显著地暴露了这一点。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这就说明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和平和战争的紧急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报纸，至今还在放肆地诋毁在艰苦条件下英勇奋斗的匈牙利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革命措施，但是对于全世界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却几乎默不作声。这些奇异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说明，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中间许多人或者并没有自觉到这一点。列宁曾经再三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之点，是否承认无产者阶级专政，乃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对于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无产阶级政权，列宁曾经要求他们“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强力手段”来镇压反革命分子，并且说：“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由此可见，人们如果因为看到了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看到了过去时期匈牙利领导者所犯的错误，

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会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也否认社会主义民主需要集中，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这种议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时候早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只要有联合活动存在，就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权威和自治之间关系是相对的，它们的应用范围是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恩格斯说：“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这是荒谬的”。他并且说，谁要是坚持这种荒谬观念，谁就是在实际上“为反动派效劳”。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派的斗争中，透彻地指出了党的有组织的领导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决定意义。在一九二〇年批评德国共产主义“左派”的时候，列宁着重地指出：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否认领导者的作用，否认纪律，“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以帮助资产阶级。这也就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等等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如果任其横行，必使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都会一败涂地。”这些原理，是否就会产生斯大林的错误呢？事实显然不是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原理，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考验，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一种可以称为例外的情况。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于实行了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了党的领导，恰恰是由于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破坏了党的领导。正确地贯彻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地加强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乃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人民、战胜敌人、克服困难而获得强大发展的基本保证。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要打击我们的事业，总是向我们要求“自由化”，总是集中力量来破坏我们事业中的领导机构，来破坏无产阶级的核心共产党。他们对于目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党和国家机关的纪律受到损害而产生的“不稳定状态”，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并且正在利用这种状况来加紧他们的破坏活动。这个事实说明，维护民主集中制的权威，维护党的领导的作用，对于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具有多么严重的意义。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党的领导而绝对不能是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用不着经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但是，正在他们进行这种宣传的时候，帝国主义对于已经建立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正在动员及准备把它们“破坏”和“搞垮”。这些国家的潜伏的和逃亡到外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也还在力求复辟。修正主义的思潮虽然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但是帝国主义者的行动，却并不有利于修正主义，而是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四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各国无产阶级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为了达到他们的毁灭共产主义事业的目的，正在利用各国人民中狭隘的民族感情和某些民族隔阂，来千方百计地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坚决地维护这个团结，把这个团结看成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动摇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动摇不定，没有明确的立场。

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因为只有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各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压迫，而实现自己的共同利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国际团结，大大地帮助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量。在十月革命来的三十九年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开始渴望解放的人们，都把关于人类光明前途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运动的胜利上面。

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苏联由于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以后，又是这一阵营中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人民能够给予最重大的援助，所以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这种情况不是任何人人人为地决定的，而是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为了各国无产阶级共同事业的利益，为了共同反对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文化的共同高涨，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完全新式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当然不会没有困难。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联合，同时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把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统一起来，而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就不能不犯错误。当各国共产党相互间保持平等的关系，经过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协商而达到意见和行动的一致，它们的团结就会增进。反之，如果在相互关系中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或者用互相干涉内部事务的办法代替同志式的建议和批评，它们的团结就会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中，由于共产党已对于国家生活担负领导责任，由于党同党之间的关系往往直接涉及国家间的关系和民族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正确处理就成为一个更加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相结合。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必须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党员和人民，因为各国人民的真正的民族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加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又必须成为本国人民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代表者。共产党人从来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他们了解，只有在正确地代表了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时候，他们才能受到本国广大人民真正的信任和爱戴，才能有效地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国际主义的教育，有效地协调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必须相互尊重对方国家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在较大国家的党对待较小国家的党的关系中，这一点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不致引起较小国家方面的反感，较大国家的党需要经常注意采取平等的态度。列宁说得对：“各国有沉语？？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遭受压迫极久的国家和民族心理残余，要特别慎重，特别注意。”

如前所说，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的关系中，曾经表现过些大国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实质，就是忽视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地位。这种倾向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旧时代大国对待小国的积习固然还会留下某些影响，而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在革命事业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难免使人们产生一种优越感。

正是因为这样，为了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需要作有系统的努力。大国主义并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现象，乙国比甲国小和落后，但是比丙国大和先进，这样，乙国尽管怨甲国的大国主义，却往往同时对于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记住的是：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也是大帝国。虽然我国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百年间成了被侵略的半殖民地，虽然我国现在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是在条件变化以后，大国主义倾向如果不竭力防止，就一定会成为严重的危险。而且应该指出，目前这种危险在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中经开始露出了苗头。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十一月一日的声明，都向自己的工作人提出了反对大国主义倾向的任务。

但是妨碍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不仅有大国主义。大国在历史上不尊重甚至压迫小国，小国在历史上不信任甚至仇视大国。这两种倾向在各国人民中以至各国无产阶级队伍中都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此，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除了首先要在较大国家中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以外，还必须在较小国家中克服民族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在大国或是小国，共产党人如果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总利益对立起来，借口前者而反后者，在实际行动中不认真维护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反而损害这种团结，这就是一种违反国际主义、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重错误。

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引起了某些东欧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满。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某些人对于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抹煞苏联的贡献。他们企图使人们不想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苏联存在，帝国主义将怎样对待这些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地看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党现在已经在认真地制止那些制造反苏谣言、在各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中煽动民族对立的坏分子的活动，并且着手破除在一部分群众中以至一部分党员中的民族主义偏见。这显然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迫切需要的措施之一。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苏联过去时期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符合于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符合于被压迫民族利益、符合于世界人民利益的。苏联人民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在援助各国人民的事业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和英勇的牺牲。斯大林所犯的一些错误，决不能使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这种历史功绩减色。

苏联政府在改善苏南关系方面所作的努力，苏联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以及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间同波兰的会谈，表示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彻底消除过去对外关系中的错误决心。苏联所采取的这些步骤，对于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很明显，当帝国主义者向各国共产主义队伍进行疯狂进攻的今天，各国无产阶级需要努力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大敌当前，那些妨害国际共产主义团结的言论和行动，无论用了什么名义，都难于指望获得望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同情。

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不但符合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和全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人民，从切身的经验出发，很容易了解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因此，帝国主义所煽动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在这些洲的十几亿人口中只能找到极少的冷落的响应，事实证明，苏联、中国、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是埃及反侵略斗争的忠实支持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三种力量，具有共同的利益，它们的相互支持对于人类前途和世界和平具有最伟大的意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最近时期重新造成了国际局势的一定程度的紧张。但是依靠上述三种力量的联合斗争，加上全世界其它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共同努力，这种紧张状况是可以重新转向和缓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没有从对埃及的侵略中得到什么东西，反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由于苏联军队对于匈牙利人民的援助，帝国主义在东欧制造战争前哨阵地和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计划，也已经归于失败。社会主义各国坚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坚持发展相互间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坚持以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坚持反对准备新的世界战争，坚持在全世界扩大和平地区、扩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所有这些努力，必将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同情。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加强，更将使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敢轻于冒险。因此，尽管帝国主义还在抵抗这些努力，但是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战争的力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如果从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算起，到现在还只有九十二年。在这九十二年中，虽然有许多迂回曲折，但是整个运动的进展是十分迅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占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苏联；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犯了一些这样的那样的错误，敌人就高兴起来了。有些同志和朋友就难过起来了，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发生了动摇。但是无论敌人的高兴、同志和朋友的难过或者动摇，都是没有充足理由的。无产阶级初次担负国家的管理，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遭到任何失败是不可能的。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局部性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任何有远见的人决不会为此而感觉失望和悲观。失败是成功之母。目前的短时间的局部性的失败，正是增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政治经验，从而为将来岁月的伟大成功准备条件。如果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来比较，我们事业中的这些失败就简直算不得什么。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一六四〇年。但是在战胜了国王以后，接着就出现了大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接着又出现了一六六〇年的旧王朝的复辟，直到一六八八年，资产阶级政党以政变的方式从荷兰迎来了一个带着荷兰海陆军进入英国的国王，这才使英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一七八九年爆发到一八七五年第三次共和国成立，经过了八十六年，中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受着全世界反动派的联合压迫，它的整个前路道路却顺利和稳定得多。这正是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空前强大的生命力。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却从此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纠正了或者正在纠正我们队伍中必须纠正的一些错误。在错误纠正以后，我们就会更加强大起来，就会团结得更好。同敌人的预料相反，无产阶级的事业将更好地前进而不是后退。

但是帝国主义的命运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那里，帝国主义跟被压迫的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帝国主义政府跟人民之间，存在着根本利害的冲突，这种冲突愈尖锐，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找出医治的药方。

当然，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目前在许多方面还有许多困难，还有许多弱点。但是比之以前苏联孤军奋斗的情况，我们现在是好得多了。而且，哪能有一种新生的事物没有困难和弱点呢？问题是在于未来。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列宁主义万岁

——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红旗杂志编辑部

《红旗》1960年4月16日第八期

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生的九十周年。

在列宁诞生后的第二年，即1871年，出现了英勇的巴黎公社起义。巴黎公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企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全世界意义的第一次演习。当公社因凡尔赛的反革命进攻而临近失败的时候，马克思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²¹

什么是公社的最主要的原则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那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掘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应当采取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熟悉无产阶级斗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正是列宁，他为了保卫公社的原则，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完全不调和的斗争。

巴黎公社没有得到成就的事业，经过了四十六年，终于在列宁直接领导下的伟大十月革命中赢得了胜利。俄国苏维埃的经验是巴黎公社经验的继续和发展。为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阐明、而为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新经验加以充实的公社原则，首先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变成活生生的事实。马克思说得完全正确：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帝国主义的豺狼们企图绞杀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联合当时俄国的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武装干涉。但是，英勇的俄国工人阶级和苏联各族人民打走了这些外来的强盗，消灭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从而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²¹ “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一次演说”

在列宁的旗帜下，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导的新的世界革命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

通过十月革命，列宁的声音迅速地传播到全世界。1919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²²。

列宁的号召所以强有力，就是因为它是正确的。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揭示了一系列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辩驳的真理。

列宁指出，少数资本主义强国的财政资本寡头，即帝国主义者，不仅在本国剥削人民群众，而且压迫和掠夺全世界，把世界大多数国家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世界大战就是由于帝国主义者贪婪无厌，为争夺世界的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动起来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帝国主义，就还存在着战争的根源，还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应当引导人民群众认识战争的根源，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列宁断言，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或腐化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因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解放的实现，决不能经过改良主义的道路，而只能是经过革命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应该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这个联盟能够粉碎帝国主义者同殖民地、附属国的封建买办反动势力的联盟，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在全世界最终地结束帝国主义制度。

根据资本主义经济上、政府上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列宁得出结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内是极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不能在一切国内同时获得胜利。因此，即使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取得胜利，但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这就不仅会引起磨擦，而且会引起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所以，斗争将是持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包括一个整个的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随时都应当警惕帝国主义侵袭的危险，竭尽全力来防止这种危险。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详尽地透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通过革命手段粉碎了资产

²² “新民主主义论”

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者的特殊的联盟，是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另一形式的继续，是为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抵抗外来的侵略，是为反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而进行的坚持的斗争，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些战线上充分发动劳动人民，顽强地和持续地进行这些不可避免的斗争，那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

列宁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头等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一个真正革命的、同机会主义完全决裂的政党，即共产党。这个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这个政党的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经过社会主义而达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这个政党要同群众打成一片，重视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在进行革命的时候，党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在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时候，党同样地要紧紧依靠群众。

这些真理，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不断揭示的。当时，世界反动派和庸夫俗子们都把列宁揭示的这些真理，视为骇人听闻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真理正在世界的实际生活中节节胜利。

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这四十多年中，世界上已经发生了新的巨大的变化。

由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苏联把一个原来在帝俄时代是经济技术很落后的国家，变成成为具有世界第一流最先进技术的国家了。苏联在经济上技术上的飞跃，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而且在技术上也把美国抛到后面去了。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中东欧的锁链。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的锁链。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有全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而人口已经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而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相对立。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现在已经占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将近 40%，不用很久，就会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

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瓦解了，并且还在进一步瓦解中。斗争当然是曲折的，但是总的说来，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正在日益广阔地席卷着亚洲、非

洲和拉丁美洲。事物的发展走向它的反面：帝国主义在那里正在一步一步地由强者变为弱者，而那里的人民却一步一步地由弱者变为强者。

第一次大战后一度存在过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局面早已结束。第二次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比过去大大缩小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比过去更加尖锐化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在每十年左右发生一次，而是几乎每三、四年发生一次。最近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承认了美国在十年内遭遇过三次“经济衰退”，而且在刚渡过 1957—1958 年的“经济衰退”之后，现在感觉新的“经济衰退”要再来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的缩短，是一种新的现象，它进一步地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接近于它的不可避免的灭亡。

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帝国主义的地盘越来越窄，狭路相逢，美帝国主义正在不断地从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手里，夺取它们原有的市场和势力范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在十几年来一直在扩军备战，而在第二次大战中被战败的西德日本两国军国主义，在它们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下又再起了。这两个帝国主义跑出来参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争夺，现在重新在大谈特谈它们的“传统友谊”，正在进行所谓“以华盛顿为起点的波恩—东京轴心”的新活动。西德帝国主义已经肆无忌惮地在国外找寻军事基地。这样就加剧了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的冲突，同时，增加了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威胁。现在情况很像第一次大战后美英帝国主义者扶助德国军国主义再起一样，而结果也将依然是他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美帝国主义者在第二次大战后制造世界紧张局势，并不是表明它的强大，而是表明它的虚弱，并且恰恰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空前未有的不稳定性。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它的独霸世界的野心，不但处心积虑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各种破坏和颠覆活动，而且借口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以镇压各国革命的世界宪兵自居，在世界上到处布置军事基地，夺取中间地带，进行军事挑战。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一样，美帝国主义者到处都碰得皮破血流，到处都在相反地激起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高涨。现在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比较起来，“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影响，正在衰落。”在他们那里，“只看到一个古罗马的衰亡时期”。四十多年来的世界变化，正是：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

天好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世界各国人民觉醒的力量超过了反动的力量。

现在的世界形势，显然已经比列宁在世时期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切变化，不是证明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而是恰恰相反，越来越鲜明地证实列宁所揭示的真理，越来越鲜明地证实列宁在保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所提出的全部学说。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为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明了一条真正能够摆脱资本帝国主义奴役和摆脱贫困的道路。

这四十年，是列宁主义在世界上取得胜利的四十年，是列宁主义在世界上日益深入人心的四十年。列宁主义不但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各国中取得了并将继续取得伟大的胜利，而且在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列宁主义的胜利，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欢呼，同时也就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的仇视。帝国主义者，为了削弱列宁主义的影响，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最野蛮的、最卑鄙的攻击和污蔑，并且从工人运动内部收买、利用动摇分子和叛徒，指使他们对列宁的学说进行歪曲和阉割。在十九世纪末年，当马克思主义击溃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并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提出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修正；现在，当列宁主义引导世界工人阶级、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派进军而获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以铁托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适应帝国主义者的需要，提出对于列宁学说（即现代的马克思学说）的修正。正如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老的修正主义当时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现代修正主义则企图证明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会议宣言说：“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宣言中这一段话，说得很正确，情形正是这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到现在是否“过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部完整的学说，是否还保持着自己的充沛的生命力？如果它还有效，还有充沛的生命力，是指它的一部分，还是指它的整体？我们平常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是否还保持它的正确性？能不能说列宁原来的结论和我们平常关于列宁主义的概念已经无效，已经不正确，因而我们应该回头去接受那些早已被列宁驳斥得体无完肤、早已在实际生活中无耻地破产了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结论？这些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彻底揭穿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谬论，清除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使一些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人们清醒过来，并且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

二

美帝国主义者，许多国家资产阶级的公开代表人、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右翼，他们为了把世界人民引入歧途，竭力对于现代世界形势进行完全歪曲的描绘，企图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列宁主义也过时了”这类呸语。铁托去年年底的一次讲话，反复地说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新时代”。

铁托说：“今天世界已进入了各国可以松一口气并平静地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的新时代”。他又说，“我们已经进入了议事日程上出现了新问题的时代，这些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合作、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就经济合作而论，也还有经济竞赛的问题。”²³这个叛徒完全抹杀了世界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企图勾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的解释。

但是，世界上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一回事呢？

帝国主义本国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可以松一口气”了吗？还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可以松一口气”了吗？

²³ 铁托 1959 年 12 月 12 日在萨格勒布的讲话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美帝国主义者为首的武装干涉“平静”了吗？在美帝国主义者还在占领我国台湾的时候，我们的台湾海峡“平静”了吗？在阿尔及利亚和非洲的许多地区的人民遭受法、英等帝国主义的武装镇压的时候，非洲大陆“平静”了吗？在美帝国主义采取轰炸、暗害、颠覆活动来破坏古巴的人民革命的时候，拉丁美洲“平静”了吗？

所谓“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是“建设”些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国家，而主要的是有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一类属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一类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铁托所说的，是帝国主义为压迫本国人民、压迫全世界、进行扩充军备的“国内建设”呢？还是社会主义为增进人民幸福、谋求世界持久和平的“国内建设”呢？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不能算成问题了吗？是帝国主义已经不存在，剥削制度已经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再存在战争的问题呢？还是让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永久存在下去，也不会有战争的问题呢？事实上，在第二次大战后，战争一直绵延不断。难道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各国革命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虽然这些战争还没有变成世界大战，但是，难道这类局部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虽然这些战争不是用核武器进行的，但是，难道用所谓常备武器进行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是否美帝国主义者把 1960 年的将近 60% 的财政预算用于扩军备战，也不算是美帝国主义的好战政策呢？是否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复活，并不会给人类带来新的大战的危险呢？

是什么“合作”呢？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保护资本主义吗？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合作”保护殖民主义吗？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保护帝国主义制度去压迫本国人民、镇压民族解放战争吗？

总之，按照现代修正主义者对于所谓“时代”的说法，就是在上述等等问题上，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挑战。他们的目的就在于抹杀帝国主义国家本国人民群众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抹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抹杀社会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的矛盾，抹杀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和帝国主义好战集团的矛盾。对于“时代”的区别，本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大体上说来，一种是胡吹瞎说，臆造和玩弄一些模模糊糊的、令人捉摸不定的辞句，从而掩盖时代的本质，这是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工人

运动中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一种是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全局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提出严格的科学规定，从而彻底揭露时代的本质，这是每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工作。

列宁这样提出区分时代的标志：“……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²⁴。列宁这里说的，所谓时代，是那一个阶级成为时代中心的问题，是那一个阶级决定着时代主要内容、决定着时代发展主要方向的问题。

忠实于马克思辩证法的列宁，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立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千百万件事实上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²⁵他认为，“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中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那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²⁶列宁总是要我们根据阶级的分析，考察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是去笼统地谈什么“一般的社会”，什么“一般的进步”。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够单单根据某些眼前事变，某种细小的政治变动，来规定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应该从整个历史时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全局，来规定无产阶级的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理论阵地。列宁正是牢牢地占领了这个阵地，而在阶级变化的新时期，在历史的新时期，得出了关于人类的希望全在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必须准备在这个大革命的搏战中赢得胜利，从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在十月革命后，1918年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过：“我们应当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从理论上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赶出这个阵地。同时，也可以从这里得出同样必然

²⁴ “打着别人的旗帜”

²⁵ “第二国际的破产”

²⁶ “打着别人的旗帜”

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就是列宁的结论，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是需要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深思的结论。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提法，是不可能推翻的，因为这种提法完全正确地把握了我们现在这个大时代的基本特征。**关于列宁主义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在这样大时代中的继续和发展的提法，关于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的提法，也是不可能推翻的，因为正是列宁主义揭露了我们这个大时代中工人阶级与垄断资本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相互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列宁主义也就成了我们胜利的旗帜。但是，同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系列的提法相反，在铁托们那种所谓“新时代”里面，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不见了，无产阶级革命不见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当然也不见了。总之，在他们那里，看不见我们时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焦点，找不到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找不到列宁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者硬说，在他们的所谓“新时代”里，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列宁所提出的“旧概念”已经不适用了。铁托提出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没有预言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²⁷。很好，不是教条主义者。谁要他们当教条主义者呢？**但是，可以是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反对教条主义，也可以是反教条主义其名，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铁托们就是属于后面这一类。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社会发展起什么影响的问题上，有一种人，他们因为不能够用唯物史观来看待它，就产生了不正确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却故意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妄图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近几年来，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站在世界的最前列。苏联的这些成就，是伟大十月革命的产物。这些突出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同时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是，在现代技术发展的新条件下，是不是像铁托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业已被马克思列宁所“没有预言”的“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所动摇了呢？能不能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社会历史观、道德观等等基本观念，业已因此变成了所谓陈腐的“教条”，阶级斗争的规律已

²⁷ 铁托 1959 年 12 月 12 日在萨格勒布的讲话

会从此再不存在呢？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活到现在，当然没有可能看见现代世界上技术进步的一些具体情况。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说来，究竟是预兆着什么？他们认为，这只是预兆着新的社会革命，决不是预兆着社会革命会消失下去。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为自然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界的新发现和进步而欢欣鼓舞。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曾说过：

“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个新的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的发现都使他感到异常喜悦，但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起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所感到的喜悦更是完全不同了”。

恩格斯在说这段话之后，接着又说“须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说得很对啊！马克思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点，而不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消失论者的观点，去看待一切征服自然界的新发现的。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马克思”一文里说：

“马克思嘲笑欧洲得胜的反动势力，它们幻想革命已被窒息，而没有想到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另外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

这件事的后果是不可估计的。经济革命之后，一定要跟着政治革命，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而已。

在马克思谈到科学与力学的这种进步时；他的世界观，尤其是现在所谓的唯物史观，表现得如此清晰，使我前此依旧保持着的某些疑点，像春天阳光下的积雪一样地融化了。”

马克思就是这样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那里，感到革命的气息的。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新进步将会引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阵地，加强唯物史观的阵地，而绝不是在动摇它。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进一步地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阵地，而决不是在削弱它。

同马克思一样，列宁也是把技术的进步同社会制度的革命问题联系起来观察的。列宁就是这样地认为：“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²⁸。

请把马克思、列宁的这种革命精神同现代修正主义者背叛革命的可耻态度比较一下吧！

在阶级社会，在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只能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待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的問題。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进步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利用原子能和火箭等类新技术来服务于国内和平建设，来征服自然界。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类新技术掌握得越多，发展得越快，就将进一步达到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同时，就将进一步增强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力量，增加保卫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所以，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福利，为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利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有可能，都应当越来越多地掌握这类为人民谋福利的新技术。现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对于新技术的发展已经显著地占着优势。人们知道，打中月球的火箭正是苏联发射的，而不是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发射的。这一点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有大量发展新技术的无限前途。

相反，由于帝国主义制度是反动的、反人民的制度。所以，帝国主义国家要把这类新技术用于侵略外国和威胁本国人民的军事目的，用于制造杀人的武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类新技术的出现，只是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它所带来的，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要永远生存下去，而将只能是进一步激发它本国人民的革命，将只能是资本主义这个吃人的罪恶的旧制度的毁灭。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利用原子弹这类武器对全世界进行战争威胁，进行讹诈。他们说，谁不服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谁就要遭到毁灭。铁托集团也随声附和，为美帝国主义帮腔，在人民群众中散播原子战争的恐怖。美帝国主义的讹诈和铁托集团的帮腔，只能暂时迷惑不明真相的人，但是吓不倒觉悟了的人民；就是暂时不明真相的人，也会在先进分子的帮助下逐步明白过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认定，在世界历史上，决定人类命运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人，是人民群众。在中国抗日战争前和抗日战争期间，在有些人

²⁸ “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中曾经一度流行所谓“唯武器论”，说什么日本武器新，技术高，什么中国武器旧，技术低，所以，他们的结论是所谓“中国必亡”。毛泽东同志当时发表的“论持久战”，驳斥了这类胡说。他作了如下的分析：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战争必败，因为它是反动的，不义的，是失道寡助的；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胜，因为它是进步的，正义的，是得道多助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由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团结起来所组织的人民军队，将无敌于天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结果如何呢？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胜利了，而那些什么“亡国论”终于失败了。第二次大战后，在朝鲜战争中，朝中人民打败了在武器装备上比自己高得多的美国侵略者，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

觉悟的人民总会找出新的办法去抵制反动派的武装优势，从而取得自己的胜利。过去历史是这样，现在和将来也还是这样。由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军事技术上已经占了优势，使美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垄断地位，同时，由于世界人民的觉悟，美国本国人民的觉悟，在现在世界上就存在着成立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协定的可能性。我们是力求能够成立这类协定的。同好战的帝国主义者相反，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是积极地、坚决地主张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和核武器。我们总是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总是为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而斗争，总是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这种斗争进行得越广泛，越深入，把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好战成性的残暴面貌揭露得越全面，越彻底，那末，也就越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人民面前孤立起来，就越有可能束缚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手足，就越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反之，如果我们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丧失了警惕性，不努力发动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把人民的手足束缚起来，那么，帝国主义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进行战争的准备，其结果就必然增加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而在战争爆发时，人民就可能因为毫无准备或准备不足，而不能够迅速地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战争，从而不能够有力地制止战争。当然，帝国主义者究竟打不打，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终究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参谋长。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已掌握了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拒绝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议，而且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所反对的，因

为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结论只能是：不论从那一方面来看，原子能、火箭等等，这些新的技术，都没有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已经改变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基本特征。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是绝对不会自己倒下去的，它将被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所推倒。当代技术的进步，不能挽救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灭亡的命运，而只是给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敲了一次新的丧钟。

三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此外，还有些人，他们并不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好心善意的人，真诚愿望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面对着某些历史的新现象，感到迷惑，有了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例如他们中有人说，美帝国主义的原子讹诈政策的失败，就是暴力的终结。在我们彻底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谬论的同时，也应当帮助这些好心善意的人改正自己的不正确的想法。

什么叫暴力？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里说得很多了。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列宁介绍了恩格斯以下的说明：“……构成这个权力的，不仅有武装队伍，而且还有实体的附属物，如监狱以及其他种种强迫机关……”。列宁告诉我们，必须区别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and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区别反革命的暴力和革命的暴力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暴力，有反革命的暴力，就必然会有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它。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消灭反革命的暴力。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就是一种反革命的暴力，就是代表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在帝国主义者没有原子弹或火箭武器以前，和有了这类新武器以后，帝国主义的国家始终是镇压本国无产阶级和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特殊力量，始终是这样的暴力机关；即使帝国主义者被迫不能使用这类新

武器，帝国主义国家只要还没有被推翻，而代之以人民的国家，代之以本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当然依旧是帝国主义的暴力机关。

从有史以来，还没有过像现在资本帝国主义者形成了的这样大规模的极端凶残的暴力。十多年来，美帝国主义者一直肆无忌惮地采取比以前野蛮百倍的折磨手段，蹂躏本国工人阶级的杰出的儿子，蹂躏黑人，蹂躏一切进步人士，而且一直肆无忌惮地公开宣称要把全世界放在它的暴力统治之下。它继续不断地在扩张自己的暴力，同时其他帝国主义者也在从事加强暴力的竞赛。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的军事膨胀，是在空前沉重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下出现的。帝国主义越是疯狂地把它的军事力量发展到最高点，就越是意味它们本身接近于灭亡。现在连有些美帝国主义者代表人，也预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但是，是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接近于灭亡，帝国主义就会自己终结自己的暴力，帝国主义国家的当权者就会自行放弃原来建立起来的暴力呢？

能不能说，帝国主义者比起过去的时期说来，已经不成为暴力的爱好者，或者对于暴力的爱好程度已经下降了呢？

对于像这类的问题，列宁早已给了多次的回答。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他是这样指出的：“……帝国主义在政治方面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十月革命后，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还特别叙述了历史，把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差别，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这种特点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比较地说，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才完全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当然，列宁这些话，是在十月革命初期说的，那时无产阶级的国家才新生，它的经济力量还很幼弱，而经过了四十多年，如我们前面所叙述的，苏维埃国家本身和全世界都已经大大改变了面貌。那么，是不是因为苏联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和平力量的强大，帝国主义的本性就已经改变，因而列宁的上述论断已经过时？或者说，帝国主义的本性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它将再不使用暴力？这种看法是否合乎真实的情况呢？

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斗争中，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很明显地占了优势。这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削弱了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拥有的暴力的地位。但是，这个事实会不会使帝国主义者从此不再压迫本国人民，不再向外扩张，进行侵略活动呢？会不会使帝国主义者的好战集团从此就“放下屠刀”、“卖刀买牛”呢？会不会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军火商集团从此就改营和平的行业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放在当前一切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而必须加以深思熟虑。显然，对这些问题看待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正确不正确，是同无产阶级事业的成败和全世界人类的命运密切相关的。

战争是暴力所表现的最尖锐的形式。一种是国内战争，一种是国外战争。暴力并不是经常都用战争这样尖锐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平时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的和平是资产阶级战时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总是互相交替地采取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形式去实行对人民统治和对外斗争。在所谓平时时期，帝国主义者依靠武装力量，用逮捕、监禁、苦役、屠杀等等这类暴力的形式去对付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同时又准备使用战争这类暴力的最尖锐的形式去镇压国内人民的革命，去进行对外的掠夺，去压倒外国的竞争者，去扑灭外国的革命；或者是，国内和平和国外战争同时存在。在十月革命初期，各帝国主义者采取战争形式的暴力对付苏联，这是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在第二次大战中，德帝国主义者采用大规模战争形式的暴力向苏联进攻，这是德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但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期又同苏联建立和平共处的外交关系，这当然也是帝国主义政策在一定条件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的确，现在出现了有关和平共处的一些新问题。帝国主义者站在强大的苏联的面前，站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面前，他们终究要考虑考虑，他们如果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国家进攻，会不会像希特勒一样反而加速自己的灭亡，会不会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反而带来最严重的后果。

“和平共处”，这是十月革命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才产生的一个新概念，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所预见的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切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某些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前期的国家”²⁹这一种情况中所

²⁹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形成的新概念，是列宁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之后所提出的新概念。如上所述，起初，帝国主义者并不愿意同苏联和平共处。只是在干涉苏联的战争遭到失败之后，只是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之后，只是在苏维埃国家业已站住了脚之后，只是在苏维埃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业已形成某种均势之后，帝国主义者才被迫得同苏联“共处”。1920年，列宁说，“我们已经争得能够同资本主义列强共处的条件，这些强国现在已经不得不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了”³⁰。可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同帝国主义实行一定时期的和平共处，完全是斗争得来的。在第二次大战之前，从1920年到1940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是帝国主义和苏联和平共处的时期。在这二十年间，苏联一直遵守和平共处的信义。但是，到1941年，希特勒就不愿同苏联和平共处了，德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地向苏联举行了野蛮的进攻。由于以伟大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世界上重新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局面。可是，帝国主义者是并没有死心的。美帝国主义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周围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网。美帝国主义一直到现在，还占领着我们的台湾，在台湾海峡随时向我们进行军事挑衅。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曾经在朝鲜土地上同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进行过规模很大的战争，而结果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失败才缔结了停战协定，但是直到现在，它还在干涉朝鲜人民的统一。美帝国主义用武器援助了法帝国主义占领军反对越南人民的战争，直到现在，也还在干涉越南人民的统一。美帝国主义曾经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的叛乱，一直到现在，还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企图利用各种方法，进行颠覆活动。事实还是如列宁在1920年2月间对美国记者所说的，在和平问题上，“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³¹。

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只能是和平政策。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我们不需要战争，决不会去发动战争，决不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侵占邻国的一寸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国同印度和缅甸这两个邻邦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国还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和亚非各国共同通过了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几年以来，我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一贯支持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

³⁰ “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

³¹ “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

府为争取和平所进行的活动，认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进行的争取和平的活动，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进一步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坚定性，也进一步地证明了各国人民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世界大战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必要性。

1957 年的莫斯科会议宣言说：“维护着和平事业的是当代的这些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反帝立场上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的亚非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首先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坚决反抗新战争的策划的，还有欧洲宣布中立各国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只要继续发展这些强大力量，和平共处的局面就有可能继续保持，甚至可以正式取得某种和平共处的协定，以至有可能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定。这是完全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的好事。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作为暴力最尖锐化的形式，即战争，也并没有在世界上结束。事情并不是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时候所反复说明、反复坚持的“战争是政策的继续”的定义，已经过时。³²

我们相信列宁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战争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制度。在帝国主义制度和剥削阶级死亡以前，这样性质或那样性质的战争，总还是会出现的。可能是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生的相互间的战争，可能是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可能是帝国主义国家内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国内战争，当然也还可能是帝国主义进攻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被迫进行防御的战争。所有这一切战争，都是一定阶级的政策的继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能陷入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泥坑，对于这一切战争的问题，只能采用具体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加以理解，并由此得出无产阶级在政策上的结论。正如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所说：“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策用别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帝国主义为着达到它的掠夺、压迫的目的，总是有它的两手，一手是战争，一手是“和平”；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一定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帝国主义，一手是揭穿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竭力争取真正的世界和平，一

³² 见南斯拉夫“人民军报”1958 年 11 月 28 日“积极共处和社会主义”一文

手是准备在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时候，用正义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的不义战争。

总之，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否认暴力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的根本区别；否认战争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根本区别；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否认帝国主义重新发动大战的危险性，否认只有在剥削阶级消灭之后才有消灭战争的可能性，以至于无耻地把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艾森豪威尔叫做是“消除冷战和建立持久和平及不同政治制度间和平竞赛的奠基人”³³；他们否认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还存在复杂的、激烈的，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方面的斗争；等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这些论点，都是为了毒害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思想，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

四

现代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和平政策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对内政策混为一谈，因而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就是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各国无产阶级可以抛弃阶级斗争，可以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实行“和平合作”，就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阶级应该忘记他们是在阶级社会中生活着，等等——这些论点也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护帝国主义的统治，企图使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永远接受资本主义的奴役。

各国和平共处，和各国人民革命，本来是两件事，而不是一件事；是两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概念；是两类问题，而不是一类问题。

和平共处，说的是国家与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革命，说的是本国被压迫人民推翻压迫阶级的问题，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说来，首先是推翻国外压迫者即帝国主义者的问题。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世界上却存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问题，因为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早已把这类革命或那类革命摆在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议事日程上。

³³ 见南斯拉夫“战斗报”1959年12月4日“艾森豪威尔到达罗马”一文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一直认为，革命是每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我们一直认为，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而某一个国家人民的解放，要依靠自己国内人民的觉悟，自己国内革命成熟的条件。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谁也不能不许别国人民进行革命，也不能用“揠苗助长”的方法来制造别国的革命。

在1918年6月间，列宁说得好：“有人以为，革命可以在别的国家里按照定单和协议来进行。这些人不是疯子，就是挑拨者。近十二年来，我们经历了两次革命。我们知道，革命是不能按照定单和协议进行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³⁴。除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外，中国革命的经验不也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吗？我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经历了几次革命。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也是像疯子一样，总说我们的革命是按照什么外来的定单和协议进行的。但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的革命并不是由国外输入的，而是因为我国人民群众不能够在旧中国继续生活下去，因为我国人民要求创造自己的新生活。

当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帝国主义进攻而被迫进行防御战争并举行反攻的时候，像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那样，为着追击和消灭这种从国外来的敌人因而越出国境，这应该不应该呢？毫无疑问，这是完全应该的，完全必需的，完全正义的。根据共产主义者的严格的原则，必须是绝对地限制在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这样做。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在不是受到国外敌人侵略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军队越出国境。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军队是正义的军队，在他们因为反击国外敌人而不得不越出国境的时候，当然会在他们所到的地方，发生影响，发生作用，但是，即使这样，在那些地方，在那些国家，也还只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才能够出现人民的革命，才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革命思想的传播，从来没有国家的界限。但是它只有在具体国家的具体条件下，经过人民群众的手，才会获得革命的果实。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这样，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也完全是这样。处在革命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曾经把卢梭的“民约论”当作福音，而革命的各国无产阶级则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等当作福音。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意识不同，革命性质

³⁴ “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

不同，而只要那个国家有那种革命的要求，并且在革命危机成熟的时候，就谁也阻止不了革命的爆发。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人类有史以来一切社会的更迭，都是这样。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这些也都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所有这些更迭，也都是通过革命。

臭名远扬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曾经说过以下一段话：“你们回想一下古罗马吧，那里也曾有过一个统治阶级，它不从事劳动而只是生活得很好，结果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样一种阶级必须逐渐地交出它的统治。”³⁵所谓奴隶主“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是伯恩斯坦不能掩盖的历史事实，正如现在美帝国主义者也不能掩盖自己日益变弱这个现实的事实一样。但是，这一个无耻的、以历史家自命的伯恩斯坦，他偏偏想掩盖古代罗马史如下的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奴隶主并不是自己“交出它的统治”，它的统治是被长期的、反复的、绵延不断的奴隶革命所打垮的。

所谓革命，就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的暴力，意味着革命战争。奴隶革命是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列宁说得对：“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企图才取得政权的。”³⁶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里还得用列宁的话来回答问题。第一，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³⁷第二，正如列宁所说的：“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因此，我们怎样去设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我们还得再用列宁以下两段话来回答问题。我们读一读列宁以下的一段话吧：“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

³⁵ 见伯恩斯坦的“经济生活的各种形式”一文

³⁶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³⁷ “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³⁸列宁这一段话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的。

我们再读一读列宁以下的又一段话吧：

“假使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先生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所有的资本家先生也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伟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³⁹

问题又被列宁说得很清楚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列宁这些论断的最好的事实的见证者。

我们中国革命同样地也是列宁这些论断的最好的事实的见证者。人们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二十二年的残酷的国内战争，才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取得政权的。

第一次大战以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使资本家先生们不是直接地、公开地掌握政权，而是经过它们的仆役——社会民主党那些叛徒们代理政权的时候，那些卑鄙的叛徒也当然会随时按照资产阶级的旨意，掩护资产阶级的白卫军暴力，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们投入血泊里。当时的德国就是如此。战败了的德国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人掌管。刚上台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立即在 1919 年 1 月向德国工人阶级实行了血腥的镇压。请大家回忆回忆被列宁所称为“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是怎样地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暴力下面流了他们的鲜血吧！请大家回忆回忆列宁所说的，那些叛徒们——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怎样地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无耻”⁴⁰吧！请大家根据历史上和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一切血淋淋的事实，想想老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谓“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一连篇的鬼话吧！

照上所说，是否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条件下，也拒绝采用和平过渡的方针呢？不。绝不是这样的。

³⁸ “预言”

³⁹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⁴⁰ “给欧美工人的信”

大家知道，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这个有名的著作中曾经回答过“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来废除私有制”的问题。

恩格斯答：

“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很少想反对这样办的。共产主义者知道得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也不能定做，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大受压制，并且也看到共产主义者的反对者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

恩格斯这一段文字，是在一百多年前写的，但直到现在，我们读起来还是多么新鲜呵！

大家更知道，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列宁采取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列宁认为这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⁴¹。他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白卫军破坏了这种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而在7月间群众和平性质的示威中，使彼得格勒的街道流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因此，列宁指出：“和平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不可能的了。开始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⁴²

大家也知道，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当全国人民普遍热望和平的时候，我们党曾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并且在1946年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实行国内和平的协议。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了这个协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这就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进行革命的战争。由于我们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没有放松警惕，没有放弃了人民武装，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战争并没有吓倒人民，反而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对于人民最有利益的；有这种可能而不利用这种可能，是不对的。共产党人一旦在遇有“革命和平发展”这类机会的时候，必须像列宁那样紧紧抓住它，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但是，这类机会，总是如列宁所说的，是“革命历

⁴¹ “革命的任务”

⁴² “论口号”

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如果在一国范围内，某一个地方政权已经处于革命力量包围之中，在全世界范围内，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处于社会主义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形下，或许有更多的可能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也绝不能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唯一的可能性，而应当同时准备革命非和平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例如，在中国大陆解放以后，某些由奴隶主和农奴主统治的局部地区，虽然已经处于绝对优势的人民革命力量包围之中，但是，正如中国一句老话，“困兽犹斗”，那里一小撮最反动的奴隶主和农奴主还是要最后挣扎，拒绝和平改革，举行了武装叛乱，而只有在这些叛乱平定之后，才能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

能不能说，在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者为着保护它们的野蛮的吃人的制度，从来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一直武装到牙齿的时候，事情会如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帝国主义已经对本国无产阶级、本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变得非常“和平”，因而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所说的那种“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世界上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遇到的经常状态呢？因而列宁所说的那种“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俯拾即是的机会呢？我们认为，这种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忘记这个真理：一切统治阶级的武装首先就是为的压迫本国的人民。帝国主义者只有在压迫本国人民的基础上才可能压迫其他国家，才可能发动侵略，才可能进行不义的战争。他们要压迫本国人民，就需要维持和加强反动的武装力量。列宁在 1905 年的俄国革命中，曾经写道：“常备军的作用，与其说是反对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反对内部敌人”⁴³。对于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说来，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说来，这个论点对不对呢？能否说在当时是对的，而到现在已经是错了的？在我们看来，这个真理到现在仍然是驳不倒的，并且事实越来越证明它的正确性。认真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看清这一点，就不能找到解放自己的道路。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中，把革命问题集中到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一点上。他摘录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最重要的几段话，其中写道：“在 1848 年至 1849 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用以进行反劳动战争的全国武器’。”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反劳动战争的主要机器，就是它的

⁴³ “军队与革命”

常备军。因此，“公社所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所以，我们的问题，结果还是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把英国和美国看成例外，认为这两个国家有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为那时候这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还不大发展。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所说的这个例外已经失去时效”，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完全落入一般欧洲式的，号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阀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了”⁴⁴。这是列宁同当时机会主义者论战的一个焦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歪曲马克思那个“已经失去时效”的说法，企图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即反对无产阶级为着争得解放，必需有革命的武力和武力的革命。列宁给考茨基以如下的回答：

“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手段对付资产阶级；这个暴力手段之所以特别必要，是因为存在有军阀机关与官僚制度，关于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极详尽地说明过……。但是，正是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时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恰恰是在英美两国没有存在这些机关（而现在，这样的机关在英美也有了）”⁴⁵

可见，无产阶级采用武力革命的手段，是出于被迫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愿意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只要有和平的道路可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不会放弃这条道路。但是，当资产阶级拥有强大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目的就是在堵塞这样的道路。

上面引述的话，是列宁在1918年11月间写的。而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是不是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列宁那些话只在历史上是可以算数的，而在现在情况下已经不能算数呢？大家都看到，现在的情况是差不多没有例外的，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帝国主义大国，都在拼命地加强它们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尤其是它们的军事机器。

⁴⁴ “军队与革命”

⁴⁵ “国家与革命”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上说：“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这样，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

这是列宁逝世后几十年间，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新总结。

问题并不是无产阶级愿意不愿意进行和平的变革，而是资产阶级接受不接受这种和平的变革。作为列宁的学生，对于这个问题就只能这样地看待。

所以，同那些用和平过渡的空谈来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只有根据每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具体条件，才能够提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无产阶级决不能片面地、没有根据地把思想、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而必须同时准备两手，就是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又准备革命的非和平发展。如何过渡，是武装起义过渡，还是和平过渡，这是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根本不同的另一个问题，是每个国家内政的问题，是只能由每个国家每个时期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去决定的问题，是只能由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自己作出决策的问题。

五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说过第二国际的历史教训。他说，第二国际时期的无产阶级运动是“向横广方向发展，以致革命水准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而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了可耻的破产”⁴⁶。

什么叫做机会主义？根据列宁的说法：“机会主义是牺牲根本的利益，贪图暂时的局部的利益”⁴⁷。

什么叫做降低革命水准？这就是机会主义者力图使群众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日常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上面，而忘记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

⁴⁶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⁴⁷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应当从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着眼来看待议会斗争的问题。

列宁告诉了我们关于议会斗争的局限性，但是，他也警告共产主义者必需避免犯偏狭的宗派主义的错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一本名著中，说明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什么条件下抵制议会是正确的，而在什么条件下抵制议会则是错误的。列宁认为，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都应当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参加必要的议会斗争。如果共产党员只会讲革命的空话，不愿意做不屈不挠的耐心的工作，回避必要的议会的斗争，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只有害处。当时列宁批评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员拒绝参加议会的错误。他说：

“‘拒绝’参加国会的幼稚气，就在于他们想用这样‘简单的’、‘轻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解决’与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种困难任务，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掩耳盗铃，只是闭起眼睛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这种困难罢了。”

为什么要参加议会的斗争？列宁认为，其目的就在于同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或者如他在另一处所说的，“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乡村中不开通的、被抑压的和愚昧无知的群众”。

这就是说，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把议会的斗争同革命的斗争统一起来，而不是相反地要使我们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使议会的斗争脱离了革命的斗争。

又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又不要降低革命水平，这就是列宁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斗争中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

又要参加议会的斗争，又不要迷信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为什么？因为，即使工人政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或者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是，只要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那末，议会也还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并且，只要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资产阶级完全可以随时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除了在必要时采取解散议会的办法以外，还能够采取公开或幕后的各种把戏，使议会中原来第一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变成少数派，或者使工人阶级政党纵使能够在选举中得到比以前更多的选票，而却减少了议会的席位。因此，很难设想，资产阶级专政本身会因议会的选票而发生变化；也很难设想，无产阶级会因为获得多少议会选

票，而就有可能在那里采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措施。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老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第二次大战后欧洲和亚洲各国的经验又对这一点再作了新的证明。

列宁说：“无产阶级要是不把大多数居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把这种争取工作局限于或者受制于设法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获得大多数选票，那就是极端愚蠢或欺骗工人”⁴⁸。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列宁这个说法是陈旧了的。但是，摆在我们眼前的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列宁这个说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却依然是苦口良药。

降低革命水准，就是降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准，就是把政治斗争降低到经济斗争，把革命的斗争降低到仅仅局限于议会的斗争，就是为了暂时的利益，而拿原则去做交易。

在二十世纪初年，列宁在他的“做什么”？一书中就已经提出要注意“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发生了理论水平的某种程度的降低”的问题。列宁引述了马克思论“哥达纲领”一封信内所提的意见：为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起见，可以缔结条约，但决不要拿原则来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接着，列宁写了以下一段话，这一段话到了现在几乎已经为一切共产党人所熟知了。列宁是这样写的：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当醉心于最狭隘实际活动的偏向与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打成一片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极力坚持这一思想”。

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多么重要的启示呵！整个的俄国革命运动，就是在以伟大的列宁为首的布尔塞维克党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而在 1917 年 10 月取得胜利的。

在上述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有过两次的经验。第一次是在 1927 年革命时期。当时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对于我们党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失掉了共产党应有的原则立场，主张在原则上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结果使革命失败。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揭开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认为共产党决不能在抗日主张的原则上对国民党让步，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

⁴⁸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主义则重复了十年前陈独秀的错误，要在原则上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因此，我们全党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很大的论战。毛泽东同志说：

“……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⁴⁹。正是由于我们党中央在原则上毫不让步，对于我们党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因而巩固了和扩大了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阵地，因而也巩固了和扩大了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结果就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人民力量，并且使我们能够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大规模进攻，而在全中国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合作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就容易发生右倾的错误，而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决裂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就容易发生“左”倾的错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曾经多次地进行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者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正确处理中国的复杂的阶级关系，不懂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阶级，采取不同的正确政策，而简单地实行了只斗争、不联合的错误政策。不克服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够胜利的。

根据列宁主义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这个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各个时期正确地确定革命的对象，解决组织主力军和同盟军的问题，解决依靠谁和团结谁的问题。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紧紧地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必须紧紧地依靠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即广大贫农群众，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然后才可能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并且，也才有可能按照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建立劳动人民和可以团结的非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如果不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各个阶段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企图使人相信，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上述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是荒谬绝伦的说法，这完全是欺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曾经指出，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有小资产阶级的“社

⁴⁹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会主义”，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封建的“社会主义”，等等。现在，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世界各国中，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向往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剥削阶级中，也就更多地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所谓“社会主义”。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也“想用各种万应药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弭社会灾难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他们“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士大夫’阶级请求援助”⁵⁰。他们不过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资本主义的实际。在这样的情形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同一切降低革命水准的倾向，特别是同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目前保卫世界和平的问题上，也有人说，什么意识的争论已经不需要了。或者说，什么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没有方针的分歧了。这就等于要把共产党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降低到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水平。这种说法就是受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而使自己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是两种不同的斗争。如果没有把这两种不同的斗争适当地加以区别，就是错误的。参加和平运动的社会成份，当然要复杂得多，其中还包括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我们共产党人站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核武器的最前线。在这样的运动中，我们要同许多复杂的社会成份在一起，为争取和平而成立必要的协定；但是，我们又必须同时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原则性，不要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不要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把自己降低到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水平。这就存在着又联合又批评的问题。

现代修正主义者嘴里的“和平”，是在于给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作粉饰工作，是在重弹那些老早被列宁驳斥过的老机会主义者所谓“超帝国主义”的论调，是把我国共产党人关于两种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曲解为消灭各国内部的人民革命。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有句可耻的有名的话，叫做“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有类似的说法，就是：和平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因此，他们所谈的“和平”，完全局限于为帝国主义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接受的“和平”，是企图降低各国人民的革命水准，使各国人民失却革命的斗志。

⁵⁰ ‘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

我们共产党人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为争取实现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斗争。同时，我们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我们支持被压迫人民争取自己解放、争取社会进步的革命战争，因为这些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当然，我们还必须继续向群众说明列宁关于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是现代战争根源的论点，还必须继续向群众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我们斗争的最后目的就是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帝国主义的论点。在群众面前，我们必须不掩盖我们自己的原则。

六

我们现在正处在帝国主义制度进一步地加速崩溃、全世界人民的胜利和觉醒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伟大新时代。

现在全世界各国人民比过去要幸运得多了，因为在十月革命之后四十多年间，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类摆脱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成立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真正地建立着国内持久和平的生活，他们在影响着全人类的命运，而将大大加速全世界的普遍的持久的和平日子的到来。

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站在最前列的，是伟大的苏联，是列宁和苏联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首创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已经实现了列宁的理想，早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而且现在正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开始着一个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时期。苏联的英勇的、具有巨大智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为建成共产主义这一个伟大目标的斗争中，掀起了伟大的劳动的新高涨。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的每一个新成就而欢呼。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并且沿着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大道，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已经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原则，在我国条件下，创造性地给我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正确方针，鼓舞了全国群众的首创的革命精神，因而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我国的面貌。

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亚洲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地在我们的共同的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飞跃的成就。

列宁主义是战无不胜的旗帜。世界劳动人民紧紧地掌握着这个伟大的旗帜，就是掌握着真理，就是为着自己开辟不断胜利的道路。

我们永远地纪念着列宁。而当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沾污列宁主义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旗帜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列宁主义。

大家都会记得：列宁在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里，说过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列宁说，在他们逝世后，就会出现曲解，“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其革命锋芒，而使之庸俗化。”列宁接着说：“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这样‘修琢’马克思主义的事情上正趋于一致了。他们把这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加以割裂、曲解和遗忘，而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觉得可以接受的东西，提在第一位，加以颂扬。”是呵，现在我们正是又遇到了美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他们又以神甫的脸孔出现，甚至称说马克思是“十九世纪的伟大思想家”，甚至承认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关于资本主义寿命不长的预言是“有根据的”，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神甫们说，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最近几十年，马克思主义就不正确了，因为资本主义业已过时，业已停止存在，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我们听到帝国主义神甫们这些鬼话，就会感觉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语言，是同他们趋于一致的。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并不限于曲解马克思的学说，而且还进一步地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继承者和发展者——列宁的学说。

莫斯科会议宣言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有人说，莫斯科会议的这个判断已经不适合于今天的情况。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会使人忽视对修正主义这个主要危险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很有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正如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曾经有一段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在那个时期产生了伯恩斯坦的老修正主义一样，在现在帝国主义被迫接受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某种“国内和平”的情况下，修正主义的思潮最容易滋长和泛滥。因此，我们对于工人运动中的这种主要危险，不能不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

作为列宁的学生，作为列宁主义者，我们必须完全粉碎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学说的企图。

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完整的革命学说，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继续表达了无产阶级思想的完整的革命世界观。这个完整的革命学说，完整的革命世界观，不能加以曲解和割裂。我们认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

主义的企图，不过是帝国主义末日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而已。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节节胜利的面前，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节节胜利的面前，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日益巩固的面前，在全世界人民日益觉醒为摆脱资本帝国主义枷锁而不断地进行英勇的斗争的面前，铁托们的修正主义者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

伟大的列宁主义万岁！

《红旗》1960年4月16日第八期

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

陆定一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四月二十二日，是伟大的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列宁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中，坚决地保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学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名字，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心目中，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象征，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象征。

九十年前，当列宁诞生的时候，人类还处在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的锁链，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暴力统治，取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实现了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梦想，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帝国主义妄想扼杀这个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勾结当时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武装干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英勇的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消灭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列宁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指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在列宁逝世之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列宁的指示，使苏联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迅速地从经济落后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侵略的主力，帮助东欧各国的人民赢得了自己的解放，帮助亚洲各国的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地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对世界和平作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现在，苏联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苏联的经济建设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科学技术有了飞跃的发展。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批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火箭，开辟了人类征

服自然的新纪元。这些伟大的成就，大大鼓舞了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

列宁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是在同帝国主义、各种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者的激烈斗争中度过的。列宁主义是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的特性，列宁主义的精华，就在于它的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列宁主义不但全部地复活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所磨灭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

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到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全面地暴露出来了。这就给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这个新阶段作出新的分析。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列宁，他执行了这个任务。

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彻底地驳斥了工人阶级的叛徒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对帝国主义的粉饰和辩护。列宁科学地论证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同本国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宗主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发展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只有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帝国主义企图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用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用镇压国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战争，把千百万人投入血海中，来消除上述一系列的矛盾。但是，同帝国主义的愿望相反，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战争并不能消除帝国主义的矛盾，恰恰更加剧了这些矛盾，更促成了革命的爆发。

大家晓得，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在他著名的那封《远方来信》里，曾经就俄国的革命问题指出，当时，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这样一个“万能的导演”：它大大加速全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空前严重的全世界经济、政治、民族的和国际的危机，并且使得遍体血污的俄国沙皇制度的车子，碰到这样一次世界历史中的特别急剧的转折，就一下子颠覆下去。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任何场合，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制度，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必然地、

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被帝国主义“强大”的外表吓破了胆，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收买，为帝国主义服务。他们按照帝国主义的利益，在工人群众和人民群众中，散布改良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影响，反对革命的道路。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时候，堕落到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耻的立场。同机会主义者相反，列宁一向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上，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前线。列宁拆穿了机会主义者的帝国主义帮凶的面目，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当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就主张用革命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

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中。为了粉碎考茨基之流粉饰资产阶级民主制和麻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修正主义“理论”，列宁反复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他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是为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抵抗外来的侵略，为反对旧势力及其传统而进行的坚持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比之资产阶级专政，是民主得百万倍的政治制度。

列宁光辉地运用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把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根本指导方针。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列宁又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最后目的，还必须继续前进，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列宁说：“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当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

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得到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从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胜利，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各国取得胜利，将包括一整个的历史时代。列宁对世界革命的前途满怀着信心，他在最后的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

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必然要取而代之。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进一步地阐明了这个规律，并且高度地赞扬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向全人类指出了彻底解放的道路，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

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中国革命就有了正确的方向，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毛泽东同志充分地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在我们的条件下，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革命道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地由一个胜利进到另一个胜利。

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胜利，是经过二十多年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才取得的。

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帝国主义是站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的敌人。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曾遭受到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又武装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我国的安全，武装占领我国的领土台湾，并且采取封锁禁运的办法，和企图利用所谓“民主个人主义”，来消灭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的革命精神，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清除了帝国主义及其奴仆所散布的亲美、崇美、恐美的心理，坚决地同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作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统治，并且巩固地保卫着我们的革命果实。

我们的党，曾经同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两次合作，两次分裂，所以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和斗争的问题上，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我们的党，不仅有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也有和平斗争的丰富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正确地具体地只用了列宁所阐明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

彻底进行民主革命的只想，民主主义革命是农民战争和土地革命的思想，和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对我们革命的不断胜利起着指导作用。

列宁告诉我们，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不行的。这个党，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应当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应当同广大劳动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我们的党是在反对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斗争中，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经过了多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我们的党才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领导，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才能够巩固地取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民主革命得到彻底的胜利，并且使民主革命的胜利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我们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是我们极重要的思想武器。

我们的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学说，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正确地具体地解决了我国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列宁在说到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时指出，“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又说：“民主革命实现得愈完全，这个新的斗争(指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开展得愈早，愈广泛，愈纯粹，愈坚决。”我国的情况完全证明了：民主革命愈彻底，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展得愈迅速、愈顺利；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愈彻底，社会主义建设也进行得愈迅速、愈顺利；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又必将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

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说，我们不但在经济战线上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还要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断地清除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不断地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样，就能够充分发动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

如列宁所说的“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因而大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跃进。

有一种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中，只有敌我矛盾，没有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只有互相适应的一面，没有互相矛盾的一面；社会主义建设，只要依靠技术，不需要依靠群众；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巩固，无须发展，即使还要发展，还要前进到共产主义，也无须经过斗争，无须经过质的飞跃；所以，人类社会的不断革命的过程，就到此为止了。这在哲学思想上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了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的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同上述形而上学的观点根本不相同的。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其他著作中，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它还不是完全的、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它只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还要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向完全的、成熟的共产主义过渡。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就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积极地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中共中央指出了我国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这就是：“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

我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胜利，都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得到伟大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援助，得到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援

助，得到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援助。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中国人民是永志不忘的。

我们现在正处在帝国主义制度进一步加速崩溃、全世界人民的胜利和觉醒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伟大的新时代。

对于这种形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从根本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得出了根本不同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这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空前有利的新时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空前有利的新时代。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全世界人民必须进一步地加强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促进革命的发展，保卫世界的和平。现代修正主义者却认为，这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已经从世界议事日程上消失的“新时代”。他们认为，不要经过革命，帝国主义就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不要进行反帝斗争，持久和平就会自然到来。这样，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

现代修正主义者篡改、阉割和背叛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论据，是所谓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已经过时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已经放弃了”。他们借口所谓“应当历史地、非教条主义地”对待列宁的理论遗产，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内容和革命精神。

在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力量占了优势的条件下，帝国主义内部困难重重，它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帝国主义者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千方百计地进行挣扎。最近时期，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推行他们的侵略和掠夺政策，麻痹世界人民，力图采取某些更加狡猾的、更具有欺骗性的策略。连美帝国主义者，有时也并不隐讳他们要采取所谓更“灵活”的策略。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交替使用战争手法和平手法。他们一方面加紧扩军备战，进行核战争讹诈，另一方面，散布“和平”的烟幕，使用糖衣炮弹，企图造成帝国主义主张和平的假象。他们一方面对革命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另一方面，进行欺骗和收买，企图软化和分裂革命运动。帝国主义者采取这些欺骗的办法，无非是为了掩盖他们的掠夺和侵略的本质，掩盖他们准备战争的步骤，以图达到瓦解各国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瓦解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奴役各国人民，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针对着帝国主义反对人民的各种手法，全世界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必须运用各种各样的革命斗争的手段和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革命斗争中，应当有原则的严肃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各种各样的革命手段和斗争形式，包括非法的和“合法”的，议会外的和议会内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军事的和思想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充分地揭露帝国主义，拆穿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不断地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更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展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准备和取得人民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从来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应该联合自己的后备军。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的广大人民是无产阶级的基本同盟军，无产阶级除了应当同他们结成巩固的同盟以外，还应当在各个不同时期团结各种可以团结的人。当然，无产阶级也应当为了人民的利益，充分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哪怕这些矛盾只是一时的、部分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在同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斗争中，只要有可能，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和平谈判和相互访问，争取用和平方法而不是用战争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争取订立和平共处的协定或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完全允许的，必要的，是对各国人民有利的。

苏联政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作了巨大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积极支持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东西方首脑会议、关于全面裁军、关于禁止核武器等和平倡议。

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屈服投降。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已经自动放弃，因此，反帝斗争不需要了，革命也不需要了。他们极力掩盖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帝国主义，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艾森豪威尔涂脂抹粉。在他们的口中，艾森豪威尔成了“和平使者”，美帝国主义已经不是和平的敌人，已经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总而言之，照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帝国主义似乎同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果谁还要坚持同帝国主义斗争，还要坚持革命，那就是妨碍和平，妨碍和平共处，就是“僵硬的教条主义”。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很懂得什么叫做教条主义，并且不断地同教条主义作斗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同教条主义斗争的问题上，就具有丰富的经验。教条主义者是要革命的，但是他们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们不懂得利用敌人的具体矛盾，不懂得集中力量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不懂得去同各种中间力量进行适当的联合，不懂得灵活运用斗争的策略和方法，结果是使无产阶级陷于孤军作战。这种教条主义，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要反对它。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着推进革命，为着打倒敌人。这些人恰恰同我们相反，他们是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革命，企图取消革命，曲解和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他们遗忘、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唤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并且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有些个别问题的提法，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有所改变。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是绝对不能改变的。列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曾经改变过马克思、恩格斯对个别问题的提法，并且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所不可能提出的问题。但是这种改变，不但丝毫没有减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而且更加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斗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在阶级社会里是这样，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是这样，只是那时的革命，在性质上和方法上不同罢了。

我们知道，美帝国主义，是各国人民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和平的最凶恶最狡猾的敌人，而艾森豪威尔是现在美帝国主义的首脑。列宁早就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扮演着宪兵的角色。现在，美帝国主义更以世界宪兵自居，到处绞杀革命，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破坏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美帝国主义不仅时刻企图颠覆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极力向中间地带扩张，妄图独霸世界。美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直到现在并没有改变。美帝国主义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后支柱。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要争取民族解放，全世界人民要维护世界和平，都必须把斗争锋芒指向美帝国主义。敢不敢揭露帝国主义

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敢不敢同他们作斗争，是要不要进行人民革命，要不要争取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要不要争取真正的世界和平的试金石。

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就必须联合全世界一切革命的力量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只有把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组成强大的反帝国主义战线，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才能够进一步地有效地保卫世界的和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主力。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样地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离开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就会大大削弱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而有利于帝国主义。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要起来革命，打碎压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束缚不了的。他们的革命斗争起着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制度的作用。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毫无保留地、坚决地支持这种正义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起来革命，推翻垄断资本的反动统治，同样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住、束缚不了的。他们的革命斗争可以束缚住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手足。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样应当毫无保留地、坚决地支持这种正义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这两种斗争，也就是有力地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下，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获得的胜利成果，同时必须支持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向前发展，不断地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直到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灭亡，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作为列宁主义者，必须经常记住列宁的这些基本论点。

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企图阻碍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适应了帝国主义的这种需要。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中，能够起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右翼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指出了在当前形势下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要性。

宣言指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竭力从思想上腐蚀群众，歪曲社会主义和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群众中制造迷惑和混乱。因此，加强对于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揭穿帝国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造谣诬蔑，通过生动的和有说服力的形式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各国人民间的和平友好，具有首要的意义。”

宣言又说，“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他们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否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要求放弃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首先是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某种争论不休的俱乐部。”

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高度发扬列宁的革命精神，彻底揭露帝国主义代理人褻现代修正主义的真面目，是我们神圣的责任。

莫斯科会议宣言，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所公认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我们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一起，忠实地遵守和执行这个伟大的纲领。

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世界各国人民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胜利的根本保证。为了社会主义各国的利益，为了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我们都必须时时刻刻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维护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维护全世界人民的团结。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在全世界赢得彻底胜利，也一定能够在全世界赢得彻底胜利。持久的和平一定会来到人间。

让我们在伟大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吧!(长时间热烈鼓掌)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根据《陆定一文集》刊印

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

《人民日报》编辑部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全世界觉悟的劳动人民，今天都在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诞生的九十周年。

列宁是苏联共产党的创立者，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缔造者，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袖。列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都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列宁指导下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上六分之一的土地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在差不多三十年以后，欧洲和亚洲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拥有世界土地四分之一以上，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得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中国人民对于列宁的理论和事业感到十分亲切，中国人民正是从列宁主义找到了自己解放的道路。还在中国很少人知道列宁的时候，列宁就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再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伟大意义和伟大前途。早在 1913 年，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就提出了亚洲是“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的著名论断。随后，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就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帝国主义必然在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斗争中灭亡，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反革命的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巩固同农民的联盟，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努力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在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时候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按照中国的通俗说法，就是既要有联合又要有斗争）；必须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必须反对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和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必须坚决信任群众和依

靠群众。列宁的这些学说，武装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也武装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所以能够迅速地为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接受，主要地是由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除了进行坚决的斗争求得解放以外，再无任何别的出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极端残酷和极端野蛮的统治下的旧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怎么能够幻想帝国主义有什么“好心善意”呢？怎么能够幻想反动统治阶级会自动让出政权给人民呢？

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使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地推进了中国的革命斗争。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叛变革命，行人民投入血海的时候，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就不能不以革命的暴力去抵抗反革命的暴力，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和中国取得的许多胜利，越来越显著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取得解放的行动指南，是全世界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行动指南。

在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的有三个方面的任务，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争取世界和平的任务，团结国际友人的任务。

中国人民当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成这个任务，不但对于中国人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世界人民的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也有显著的巨大的意义。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我国人民能够胜利地实现这个伟大任务的最重要的保证。

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国人民第一步要争取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

体系；要争取提前实现 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和相当程度的电气化；要努力进行文化革命，基本上普及中小学教育和业余教育，争取提前完成 1956—1967 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与此同时，要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使社会主义在一切领域内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并且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目前我国人民正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在今年内使生铁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钢产量达到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煤产量达到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发电量达到五百五十五亿度以上、粮食和棉花各增产 10% 左右，从而使今年工农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 23%。

对于中国人民能否高速度地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者亟尽诽谤嘲笑之能事。远者如过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 1958 年 11 月就说什么“很难相信这种努力会成功或持久”。近者如现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在今年 2 月又说什么中国加速工业化运动“可能造成这个政权从内部的崩溃”。可是奇怪，帝国主义的诽谤愈是恶毒，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愈高，建设干劲愈大。中国的经济形势，中国人民的政治团结，一年比一年更好。现在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人怀疑，我们一定能够提前和超额完成我们的伟大的建设计划。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贯地指出，在社会主义下，社会生产力能够得到伟大的解放，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得到伟大的解放。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都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他认为，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而这种创造的才干在工人和农民中是无穷无尽的。列宁这样描写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深奥同时也是最简单明了”的原理：“富有历史意义的行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数便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唤起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兴趣和采取自觉的态度，使千千万万的人相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对国家建设漠不关心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我们确信我国的发展速度，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将要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所曾有过的发展速度，按照中国共产党人的说法，就是能够用跃进的速度前进。这是因为，我们党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们正在实行的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国目前正在蓬勃展开的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巩固、发展，目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正是如列宁所指出的，最广泛地发动了千百万人民用最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来参加我国的建设事业。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地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发展着自己的经济建设，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正是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少见多怪的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过去曾经对于苏联的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吵闹不休，现在又在对于我们的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吵闹不休了。伟大的列宁在他逝世前一年所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我国革命》中，早就给了这伙蠢才以一个致命的痛击。列宁指出：“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而且应该表现出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点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东西。”列宁反问道：“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样呢？”列宁并且预言，“我们的欧洲庸人们作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

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苏联用了与一切西方国家不同的方法，不是已经用飞快的速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超过了西欧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正在追上和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超过美国吗？同样，在中国，“一穷二白”、毫无出路的处境，几十年斗争的锻炼和经验的积累，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和对苏联四十年建设经验的借鉴，不是也十倍地增强了中国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一切西方国家不同的方法，用飞快的速度向着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猛进吗？西方

资产阶级咒骂我们要失败，而我们队伍中居然也有那么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应声虫，说什么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产物，而不认识它们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性的产物。让他们等着看吧，等个十年，他们总可以见个分晓。总之，无论外国和中国的那些一脑子形而上学的庸人，正如列宁所说，只知道把资产阶级关系的“常态”看作不准有一点变动的金科玉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所以他们如同过去没有能力理解苏联的伟大变化那样，现在也没有能力理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生动活泼的事物。

中国人民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第二个伟大任务，就是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在一起，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在一起，同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力量在一起，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和战争期间，列宁和其他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工人阶级左派领袖所提出的革命口号，就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以便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实现和平。十月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就是和平。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立即颁布了和平法令，主张正义的和平。其后，列宁又再三提出了苏维埃国家同各国和平共处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的苏联，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实行集体安全、实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作了世所周知的巨大的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之日起，就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积极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从1950年到1953年，中国人民派出了自己的志愿军到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的侵略作了英勇的斗争，迫使侵朝美军接受了停战协定，从而维护了远东的和平。1954年，中国政府积极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同年，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先后同印度政府、缅甸政府的领导人，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一直是中国对一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基石。1955年，中国政府积极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亚非国家的万隆会议，这个会议宣布了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亚非各国相互关系中的十项原则。1958年，中国从朝鲜撤退了全部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一贯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和五洲和平运动，并且再三倡议实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安全，成立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无原子地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用和

平的方法而不用战争的方法解决同别国（包括美国）的争端，并且至今还在就这个问题同侵占着中国领土的美国举行着谈判。

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都为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坚定不移的斗争。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所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所通过的和平宣言，都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行动起来保卫和平，指出这一斗争是当前全世界最重要的斗争。莫斯科的两个宣言都指出，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强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已经有实际的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在莫斯科会议以后，和平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增强。这首先是因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更强大，苏联在军事方面和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更显著地走到了美国的前面。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对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和平访问，苏联政府在裁减军备，停止试验核武器等问题上进行了新的重大的努力，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努力正在日益深入人心。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和资本主义各国人民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也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帝国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继续扩大，美国本国广大人民对政府的反和平的外交政策纷纷表示不满和不安，美帝国主义的处境日见困难和孤立了。这种种情况，迫使新战争的主要策划者美帝国主义不能不接受东西方最高级会谈的建议，并且在一些场合改变腔调，说他们也有“和平愿望”。事实证明，世界和平力量正在胜过战争力量，这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的一种表现，

东风压倒西风，这是目前世界的新形势。这种新形势同列宁在世时候根本不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形势，也根本不同。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新战争计划的斗争中，估计到这种新形势，是完全必要的。这种新形势使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信心和勇气。但是决不能说，力量对比的这种变化，已经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因而已经从现代社会生活中根本消灭了任何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使人类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

列宁主义从来认定，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列宁说：“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齐美尔瓦耳得左派的决议草案》）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本质产生的。”（《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报告的结论》）列宁的这些具有根本原则意义的论断，是从对于帝国主义的深刻的科学分析得来的，并

且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为不可动摇的真理。在两年多以前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还以最新的事实论证了列宁的这个原理。莫斯科会议的宣言说：

“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在战后的年代里，美英法等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在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朝鲜、马来亚、怯尼亚、危地马拉、埃及、阿尔及利亚、阿曼和也门等地进行了或者还在进行着战争。同时，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顽固地拒绝裁减军备，拒绝禁止使用和生产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拒绝就立刻停止试验这种武器达成协议。他们继续所谓‘冷战’，进行军备竞赛，建立越来越多的军事基地，实行破坏和平的侵略政策，造成新战争的危险。而如果在未能缔结禁用核武器的协定的情况下发生世界战争，那么，它就必将是一场破坏力空前巨大的核武器战争。”

“在西德，在美国的扶植下，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从而在欧洲的中心造成了严重战争危险的策源地。……

“同时，帝国主义者企图强迫中东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接受臭名远扬的‘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从而对于这个地区的和平造成了威胁。……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这一侵略集团，在东南亚造成了战争危险。”

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和平宣言说：

“和平力量是巨大的，这种力量能够阻止战争，维护和平。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全世界的一切人们：可怕的、杀人的战争的危险并没有过去。”

“对和平事业的威胁，对各国人民安全的威胁是来自何处呢？热中于战争的和幻想战争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目前的军备竞赛中大发横财的垄断资本集团。军备竞赛给垄断资本家带来了巨额利润，而把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压在劳动人民的肩上，使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起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在垄断资本、尤其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压力下拒绝关于裁军、禁止核武器及其他防止新战争的措施等建议。……

“只有一切珍视和平的人们一致努力，提高对战争挑拨者的阴谋的警惕，并彻底了解到要更加努力保卫还处在威胁之下的和平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平才能够保持住。”

由此可见，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的原理，决没有也决不会“过时”。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对于战争危险的警惕决不能放松。

中国人民就是根据这个基本立场来进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的。我们欢迎国际局势的每一步缓和，欢迎任何国家（包括美国）的真诚的和平努力，同时把帝国主义继续策划新战争的凶恶活动及时地告诉全国和全世界的公众，唤起他们的注意，并且指出，只要全世界一切和平力量联合一致，就一定能够压倒战争力量，我们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过去这样做了，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

美帝国主义痛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作的一切和平努力。它公开宣布自己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明目张胆地攻击中国人民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正义立场。中国人民对于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美国政府从去年9月赫鲁晓夫同志和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以来还继续在积极扩军备战和扩大侵略的事实，作了及时的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就污蔑中国人民似乎不热心于国际局势的和缓。这个漫天大谎简直是太无耻了。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本人既然实际上是在从事扩军备战和扩大侵略，那么，这就跟和缓国际局势的要求背道而驰；如果加以隐瞒，甚至加以粉饰、美化和歌颂，对于国际局势有什么好处呢？相反，那只能使制造紧张局势的人们益发肆无忌惮。

事实胜于雄辩。试看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自从去年9月戴维营会谈以来反和平言行的一个最简单的摘要：

1959年10月16日，美国助理国务卿伯丁发表演说，认为美国不能接受和平共处，因为这等于承认社会主义阵营的现状。

10月21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非法决议，干涉中国内政，诽谤中国政府平定西藏地方农奴主反动集团的叛乱。

10月22日，美国国务院就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三周年发表声明，诬蔑匈牙利政府和苏联政府，并且“赞扬”发动这次叛乱的反革命分子。

11月3日，由于巴拿马运河人民举行示威，要求收回巴拿马对运河区的主权，美国占领军实行镇压，打伤一百二十多名巴拿马人。

11月13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说，“西方国家不能接受苏联人所谓的和平共处。”

11月22日，美国国务卿赫脱在美国“行列”杂志上发表文章，诬蔑苏联有“侵略意图”和推行“扩张主义运动”。

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诽谤阿尔巴尼亚“受苏联的统治”。

12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罗伊说：“到1963年时，美国将能够掌握型式更多的投递氢弹头的手段来对付苏联。”

12月4日至22日，艾森豪威尔以扩大冷战为目的访问了欧亚非十一国。他在访问中竭力鼓吹加强西方军事集团，说“北大西洋联盟仍然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说美国不能放弃中央条约组织，并积极活动扩展美国在国外的导弹基地网。

12月9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不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在10月27日发出的呼吁，拒绝从朝鲜南部撤退美国军队和实现朝鲜和平统一，并且坚持在朝鲜进行在作为交战一方的联合国“监督”下的所谓“自由选举”。

同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干涉匈牙利内政的所谓“匈牙利问题”的提案。

12月15日，赫脱在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上提出一个“十年计划”，要求这个集团具有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威慑力量”和进行局部战争的“充分灵活性”。

12月24日，美国指使老挝少数极端亲美分子发动军事政变，进一步扩大老挝内战。

12月29日，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国自1960年1月1日开始，“有恢复核武器试验的自由”。

1960年1月7日和18日，艾森豪威尔提出国情咨文和预算咨文，要求美国“奉献出我们的任何一点力量”，来提供“威慑力量”，规定1961财政年度的军事开支为四百五十五亿多美元，占总预算的57.1%。他在国情咨文中诬蔑社会主义国家是“警察国家”，诬蔑苏联是“帝国主义的共产主义”，诬蔑社会主义阵营是“阴郁的卫星国体系”。

1月15日，尼克松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和它的盟国都不可减少他们的兵力”。

1月19日，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在华盛顿签字，这个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直接针对中国、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且威胁亚洲各国的和平和安全。

2月3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他并且表示，美国将把核武器的秘密资料交给它的同盟国。

2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再次拒绝华沙条约缔约国会议关于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集团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2月15日，赫脱发表声明，竟然要求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重新享有国家的独立”。

2月16日，艾森豪威尔在“共同安全”咨文中说，“苏联削减军事人力的事实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话并不改变我们保持集体防御的必要性。”“放弃或削弱我们的共同威慑力量地位将是极为愚蠢的。”他说，美国要“坚定不移地、不事声张地、耐心地坚持为保持我们的共同防务而努力”。他宣布新财政年度的对外军事援助拨款为二十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多七亿美元。

2月17日，艾森豪威尔在关于中东局势的报告中说，美国将继续执行美国国会在1957年通过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即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

2月19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发表演说，表示美国要继续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仍然“期望”新中国“崩溃”，并且说美国要执行“一项谋求抵消（中国）这种力量增长的政策”，“坚持旨在对付这种力量的措施”。

2月22日至3月3日，艾森豪威尔访问南美，鼓吹加强“泛美制度”，赞扬美洲国家组织为干涉古巴而在去年8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外长会议，并且表示要继续坚持把美洲当作美国人的美洲的所谓门罗主义。

2月26日，美国在违反朝鲜停战协定不断地把导弹武器运入南朝鲜之后，公然在南朝鲜乌山发射“斗牛士”式导弹。

2月29日，美国复照古巴政府，拒绝古巴政府提出的恢复美古谈判的必要条件，即美国不要采取可能损害古巴人民的措施。并且威胁说：美国始终可以自由采取它认为有必要采取的“任何步骤”。在这之前和以后，美国飞机连续轰炸古巴。据古巴总理卡斯特罗3月14日说，美国飞机对古巴的空袭已达四十多次。

3月9日，美国负责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萨脱斯威特说，美国在北非“有着特殊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利益”。“美国保持使用它在非洲的某些重要基地的权利，美国和他的盟国继续在非洲取得广泛的重要物资，主要是矿藏，这也是十分重要的”。他并且说，“有必要把（非洲）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有条不紊地从过去过渡到未来的方法加以协调”。

3月16日，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开始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军五万人参加。

同一天，即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发表联合公报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说，“我们一致认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改变政策”。“我们不放弃我们在柏林的权利”。

3月21日，美国军舰又一次侵犯中国领海。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第九十三次严重警告。从1959年10月到现在，美国侵犯中国领海、领空共达二十一次。

3月30日，艾森豪威尔表示，即使美国现在同意签订关于暂时停止核试验的协定，下届美国总统仍然可以不受约束。他说，“任何继任者都将有权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赫脱4月8日进一步说，从法律观点来看，艾森豪威尔“使美国承担较长一段时期的义务的能力”，“仍然限于他自己的任期内”。

4月4日，赫脱发表演说，拒绝苏联关于全面裁军的建议，攻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关于德国问题的谈话，说他“使局面复杂化”。赫脱说，“如果任何人期望在最高级会议上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可能会失望”。他对西德的加快重新武装表示“满意”，并且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陆海空部队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

4月6日，艾森豪威尔正式批准加速发展洲际导弹和发射“北极星”式导弹的核潜艇的计划。据报道，美国政府准备把原定三年内制造的洲际导弹的数目从二百七十个增加到三百一十二个，核潜艇从七艘增加到四十艘。

4月9日，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潜艇舰队司令本逊叫嚷说，美国将用三十艘发射“北极星”式导弹的核潜艇来包围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

4月14日，美国代表伊顿在十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的建议，并且再一次表示美国不能接受苏联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

这里所列举的当然极不完全，而且也只限于美国政府和美国报刊所公开宣布了的材料。但是请问，这一切究竟是不是事实呢？这一切究竟是不是美国当前政策中的主要事实呢？难道能够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捏造？难道能够说，这只是美国政策中的一些次要的、不值一提的旧时代的遗迹？事实当然不是如此。事实是，尽管在戴维营会谈以后，尽管在东西方最高级会谈的前夜，我们看不出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有任何实质的改变，看不出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本人所执行的政策有任何实质的改变。美帝国主义不但正在竭力扩大自己的侵略性的军事力量，而且正在迫不及待地扶植西德和日本

的军国主义势力，使它们成为新战争的策源地。要知道，这一切事实影响着全人类的命运。反对西德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和其他为美国所扶植的军国主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对这一切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离开这一点也就离开了事实的核心，事实的本质。因此，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如果不集中力量对美国当局的这种战争政策继续进行坚决的揭露和严肃的斗争，就必然会招来惨重的灾难！

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一起站在为和平而斗争的最前线的中国人民，有什么权利对这一切事实保持沉默呢？有什么权利只让美国人作这一切，说这一切，知道这一切，而不让中国人和别国人知道事实的真相呢？难道向中国和世界的公众说明事实的真相，就不利于和平，就会加剧紧张局势，而隐瞒真相才能有利于和平与和缓局势吗？难道按照帝国主义的逻辑，和平就是这样“保持”的吗？或者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之流所说的“自由中的和平”吗？

积极策划新战争的美帝国主义者，确实希望我们隐瞒事实的真相，希望我们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希望我们相信帝国主义的本性可以改变甚至已经改变，希望我们完全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那样，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不去动员和依靠最广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群众，希望我们竭力夸大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迫作出的和平表现，使人民群众丧失警惕，或者希望我们竭力夸大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战争威力，使人民群众惊惶失措。总之，新战争的策划者希望我们同他们一样地假要和平，要假和平，以便他们可以把战争突然强加于各国人民，仍然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

但是，新战争的策划者听着吧，你们的希望是永远不会实现的！我们既然是真要和平，要真和平，我们就永远不会堕入你们的陷阱。我们必须继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一切危害和平的阴谋诡计，用最大的努力去动员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广大群众起来同新战争的策划者进行顽强的斗争，并且使他们在斗争中既保持充分的警惕，又保持充分的信心，为阻止新战争而斗争到底。只有这样，才是真要和平，才能得到真和平，否则就是假要和平，或者只能得到假和平。

尽管如前所说，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我们完全确信，只要进行团结一致的再接再厉的斗争，强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就一定有可能设置重重障碍，迫使帝国主义不能按其本性为所欲为。并且，在万一的情况

下，如莫斯科宣言所说，“如果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死亡，因为人民绝不会再继续容忍那个给他们带来如此惨重的痛苦和牺牲的制度”。莫斯科宣言指出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这不是为了减弱而恰恰是为了加强和平的前景。因为只有这样，各国人民才不致在精神上解除武装，才不致屈服在战争狂人的恫吓和讹诈之下，并且才不致在战争竟然不幸爆发的时候惊惶失措。

为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需要灵活和耐心，需要达成一定的谅解和妥协。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过去不曾杜绝过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妥协，今后也不会拒绝这种妥协。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政府关于东西方最高级会谈问题上的努力，并且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改变它迄今采取的顽固态度，从而使这一会谈能够为裁减军备问题、停止试验核武器问题、西柏林和德国问题以及和缓国际局势问题达成各国人民所期待的协议。

但是，争取世界和平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帝国主义不会轻易接受有利于和平的协议。而且，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所同意的协议，帝国主义也可以随时推翻，因此，无论为了取得有利于和平的协议，或是为了保持这些协议，都必须通过斗争。列宁说得好：“现在争取和平的斗争展开了。这个斗争是困难的。谁以为和平轻易获致，谁以为只要一提和平，资产阶级就会用盘子把和平给我们端过来，谁就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谁把这种观点妄加在布尔什维克身上，谁就是在骗人。资本家拼命厮杀，是为了分赃。很明显，粉碎战争，就是战胜资本，而苏维埃政权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开始进行斗争的。”（《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正因为现代战争是帝国主义本性的产物，而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不能不是一个持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反复地宣传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它的一切欺骗手腕，就成为目前和平事业中的一项迫切任务。

既然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必须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莫斯科宣言说：“维护着和平事业的是当代的这些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反帝立场上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的亚非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首先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坚

决反抗新战争的策划的，还有欧洲宣布中立各国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

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力图破坏这个联合斗争。他们梦想把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对立起来。他们说：既然要和平，被压迫的民族就不应该反抗侵略，被剥削的人民就不应该起来革命。他们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有不准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革命的义务。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大家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无论对于被压迫民族或者被剥削人民说来，革命总是不能输出的。同样，革命是谁也无法和无权禁止的。现代的革命基本上起源于帝国主义对于落后民族和本国劳动群众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除非帝国主义者放弃这种侵略、压迫和掠夺，除非帝国主义不成其为帝国主义，各国被压迫的人民也就不会放弃他们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

帝国主义国家至今没有停止干涉别国的内政，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却造谣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干涉别国的内政。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干涉任何别国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内政。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现在却想强迫或引诱社会主义国家帮助它们干涉别国的内政，这难道不是绝顶的荒谬吗？

在帝国主义继续存在，继续用暴力推行侵略政策、压迫政策和掠夺政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人民的反抗斗争，总是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的。因为他们的斗争代表人民的愿望，是削弱帝国主义势力而有利于世界和平的。认为这种斗争的发展和对这种斗争的支持不利于和平事业，这难道不是绝顶荒谬吗？

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努力制止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愈强大，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好和平的力量愈强大，制止战争的可能性就愈增长。因此，壮大社会主义各国的力量，壮大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壮大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力量，壮大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力量，就能够更有效地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在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第三个伟大任务，就是要巩固和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首先是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团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一开始就是一种国际的现象。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对这种支持的感谢，也永远不能忘记用自己的努力去支持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义务。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夜就着重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也正因为这样，大家知道，在北京天安门两侧的大标语，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个就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人民在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坚持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中国人民感觉欣慰的是，我们同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兄弟团结正在日益发展，我们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个爱好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的友谊正在日益扩大，我们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友好联系也正在日益增进。中国人民将在这个基础上不倦地加强我们同所有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以便为争取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共同奋斗。

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为了破坏世界人民的团结，在一些国家里疯狂地煽动着反对中国的运动。但是这种运动没有得到也永远不会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因为这种运动是毫无道理的。中国人民在自己家里勤劳地建设着和平的新生活，努力同自己的邻人友好相处，并没有跑到哪个外国和外洋去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为什么要加以反对呢？我们知道，列宁所缔造的苏联，从来就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也在长时期中受到一些大小国家（包括一些它所援助的国家，例如国民党时期的中国）的一些为着某种国内目的而反苏的人们的诽谤和攻击。但是这既没有能够丝毫损害于苏联，也没有能够阻碍各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友好的发展，而只是暴露了那些反苏分子的反和平、反人民的真面目。帝国主义和一些国家的反动派所煽动的反华运动，也只能得到同样的结局。

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一小撮反动派，现在特别疯狂地使用各种卑鄙的方法企图挑拨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团结。这些挑拨者恶毒已极，而又愚蠢已极。他们永远不可能了解，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在伟大的不可动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莫斯科宣言说：“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在统一的大家庭里，是由于它们

走上了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它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国家政权有共同的阶级实质，由于它们需要互相支持和援助，由于它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由于它们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一小撮反动派进行这种疯狂的挑拨，不是他们地位巩固的表现，而是他们接近死亡的表现。列宁主义在半个世纪中的迅速胜利，特别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以来十五年中的迅速胜利，使他们魂梦不安。在这种得到极广大群众支持的惊天动地的胜利面前，妄想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不过是如同列宁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所说的“泥塑巨人”而已。他们仇视在列宁旗帜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猛烈发展和坚强团结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愈是咒骂，就愈是证明列宁主义的必然胜利。列宁在被革命敌人攻击的时候就高兴，因为这正好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俄国大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人们对他造谣诽谤，
但是他要听到的赞扬，
不是他们甜蜜的夸奖，
正是他们的怒骂如狂。

列宁主义的正确，难道不是靠敌人的怒骂，而是靠敌人的夸奖来证明的吗？

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在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努力中，在加强对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的努力中，都曾经遇到革命敌人的疯狂攻击。但是这一切正好证明，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将永远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向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向着世界和平事业的胜利和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勇敢地前进！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在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一切其他国家，必将获得更加伟大的胜利，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当然，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途中某些曲折和停滞，毕竟不过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

我们在本文开头曾经提到列宁在 1913 年的论文《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在那篇论文里特别提到亚洲是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因为当时欧洲的革命发展曾经比较停滞。列宁当时就断言这种停滞不过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断言行将到来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列宁说：“当机会主义者还在拼命赞美‘社会和平’，拼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经在亚洲涌现出来了。……“欧洲也跟着亚洲橐不过不是按照亚洲方式橐动作起来了。……狂热的军备竞赛和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得现代欧洲的‘社会和平’活像一桶火药。一切资产阶级解体和无产阶级成熟的过程，是在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列宁的这个科学的预见在 1917 年的俄国证实了，接着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证实。现在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经不止在亚洲，而且在非洲、拉丁美洲涌现出来了。天涯地角，再没有一处是帝国主义的安全的后方。西欧和北美现在还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和平”。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狂热的军备竞赛和帝国主义的政策，由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民族独立运动、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由于和平运动的深入人心，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和平”实际上也越来越像列宁所说的一桶火药。让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一致努力，使列宁主义这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行将到来的历史时代获得更大的胜利吧！

根据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